

# 牟宗三早年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

彭國翔\*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 摘 要

迄今為止，學界對牟宗三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將其作為一個哲學家來處理的。但是，牟宗三一生其實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決非躲在象牙塔內「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對關乎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歷史和文化問題，他往往都有深入獨到的觀察。有些問題貫徹其一生，有些問題則對應特定的歷史時期，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構成當時知識人群體討論的組成部分。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前期，中國的農村問題成為關係國計民生的核心和社會各階層普遍關注的對象，牟宗三也在 1934 年和 1935 年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他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一整套看法，成為三〇年代關注並探討中國農村問題的知識人群體中的一員。可惜的是，八〇年代以來，無論在牟宗三研究的領域還是在有關三〇年代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領域，這些文章都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因此，考察牟宗三 1930 年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既可以使我們瞭解牟宗三思想歷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從而認識牟宗三在哲學之外其他方面的關懷和成就，還可以擴展我們對於三〇年代中國農村研究及其相關問題的認識。對於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中期牟宗三有關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本文的考察包括兩個部分：首先，是他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局面和社會形態的基本判斷；其次，是他提出的解決農村問題的一整套方案。

**關鍵詞：**牟宗三，中國農村問題，二十世紀三〇年代

---

\* 作者感謝審查人的意見，尤其一位審查人對照《全集》版的相應文字，仔細核對了牟宗三先生當年發表於《再生》的原文，作者尤當致謝。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peng\_gx@126.com。

## 一、引言

如果說，作為一個重要學術課題並成為知識人群體關注對象的現當代新儒學研究肇始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中期，<sup>(註1)</sup>迄今為止，現當代新儒學的研究已經經歷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歷史。二十年來，作為現當代新儒學研究最主要的對象之一，有關牟宗三的討論或許是最多的。但是，或許是研究者大都只能從自身的哲學學科訓練出發，或許是「文獻不足征」——牟宗三許多非哲學的文獻沒有被研究者掌握，到目前為止，牟宗三基本上只是被作為一個哲學家來處理的。當然，牟宗三一生最大的成就無疑在於以融攝西方哲學的方式來系統地詮釋和重建中國哲學，尤其儒家的道德形上學。但是，除了哲學之外，牟宗三其實還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和關注值得我們研究。以牟宗三最主要的成就為哲學可，僅以哲學家視之則不可。

事實上，牟宗三一生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決非躲在象牙塔內「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對關乎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歷史和文化問題，他往往都有深入獨到的觀察。有些問題貫徹其一生，有些問題則對應特定的歷史時期，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構成當時知識人群體討論的組成部分。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前期，中國的農村問題成為關係國計民生的核心和社會各階層普遍關注的對象。如何在正確認識中國農村性質的基礎上解決農村的問題，不僅是各個政治黨派最為主要的考慮，更首先成為廣大知識人的焦點意識。例如，陶直夫在作於1935年8月的〈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與農業改造〉一文中便指出：「中國的農業改造問題或農民問題，在整個民族的國民經濟的改造運動之中，應當占首要的地位；同時這個農業改造或農民問題的任務與性質，在規定中國整個改造運動的任務與性質的時候，是有決定的作用的。」<sup>(註2)</sup>而發生於三〇年代有關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性質的論

1. 大陸學界多用「現代新儒學」，而港台學界則多用「當代新儒學」，其實均指20世紀20年代以來迄今仍在繼續發展之中的「新儒學」。鑒於大陸史學界「現代」多指1919年以後至1949年以前，「當代」多指1949年以後迄今，為兼顧大陸與港台的用法，本文對於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迄今的整個新儒學運動統稱為現當代新儒學。
2.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民國叢書，第四編，第13冊，頁2-3。該書於1935年9月由新知書店初版。民國叢書所收者乃據新知書店1936年版影印。

戰以及鄉村建設運動，可以說正是這一焦點意識的兩大表現。牟宗三 1933 年北大哲學系畢業後，曾返山東任教於魯西壽張鄉村師範，1934 年秋至 1935 年秋在天津社會科學研究所。正是在這一段時間，和參與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性質論戰以及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許多知識人一樣，牟宗三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他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一整套看法，成為三〇年代關注並探討中國農村問題的知識人群體中的一員。1934 年牟宗三由張東蓀介紹列名國家社會黨，因此牟宗三的這一系列文章都發表於國家社會黨的機關刊物《再生雜誌》。<sup>(註 3)</sup>可惜的是，八〇年代以來，無論在牟宗三研究的領域還是在有關三〇年代中國農村問題研究的領域，這些文章都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因此，考察牟宗三三〇年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既可以使我們瞭解牟宗三思想歷程的一個重要環節，從而認識牟宗三在哲學之外其他方面的關懷和成就，還可以擴展我們對於三〇年代中國農村研究及其相關問題的認識。

牟宗三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分析基於其對當時中國社會形態的認識，而他對當時中國社會形態的認識，又屬於他的整個中國社會發展史觀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牟宗三二十世紀三〇年代時的中國社會發展史觀及其對於中國社會不同歷史階段的認識與分析，我們需要另作專論，此處不能枝蔓。以下，我們根據牟宗三的有關文獻，具體考察牟宗三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包括他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局面和社會形態的基本判斷以及解決農村問題的具體方案這兩個方面。

## 二、牟宗三對三〇年代中國農村經濟與社會的基本判斷

1935 年 3 月 15 日，牟宗三在《再生》第 3 卷第 1 期發表了〈中國土地分配與人口分配之原則〉，提出了他對於認識中國農村土地分配和人口分配的基本原則。1935 年 5 月 15 日，牟宗三又在《再生雜誌》第 3 卷第 3 期發表了〈中國農村生產

3. 參見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頁 5-6。惟 1935 年 5 月 15 日刊於《再生雜誌》第 3 卷第 3 期的「中國農村生產方式」以及 1935 年 7 月 15 日刊於《再生雜誌》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的〈中國農村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兩文，蔡先生將其系於 1934 年條下。或此二文撰於 1934 年，而正式發表於 1935 年，則不得而知。

方式〉，提出了他對於當時中國農村生產方式的觀察。正是基於對於中國農村生產方式、土地分配和人口分配的認識，牟宗三在 1935 年 7 月 15 日刊於《再生雜誌》第 3 卷第 4、5 期合刊的〈中國農村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這篇文章中，具體通過對「自給自足」經濟涵義的分析，在當時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爭辯之間，提出了他自己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和社會形態的基本判斷。

### (一)、土地分配與人口分配

牟宗三認為，中國農村的土地分配遵循五個原則。第一，是「家庭單純的對於土地發生關係」。牟宗三指出，「組織社會的基本團體是家庭」，<sup>(註 4)</sup>「每一個繼承其祖先遺產的家庭便是組織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基本單位可以說就是經濟關係中的組織細胞。」<sup>(註 5)</sup>而所謂「家庭單純的對於土地發生關係」，是指這樣一種情況：

在經濟關係不複雜、生產力生產方法不擴張的時候，這些組織細胞（國翔按：指家庭）間的經濟關係是十分外在的、表面的。他們只與自然的土地發生密切的關係，以期達到生產收穫的目的。目的一達，他們便可以掩柴扉，不出頭，各掃門前雪，老死不相往來。這是簡單的農業社會必有的現象。<sup>(註 6)</sup>

至於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地域差別，牟宗三也有所意識。所以他緊接著又說：「這種現象在黃河流域更其顯然持久。所以黃河流域與長江珠江流域其經濟狀況是有顯著差別的。這差別將就在這個單純的與土地發生關係，以及不只單純的與土地發生關係，這方面去認識。」<sup>(註 7)</sup>

第二，是「土地的自然分配」。在牟宗三看來，這種分配是指在生產力不發達的較為原始的社會中，每個家庭彼此佔有差不多的土地，於是在分給其子孫後代時，結果也相差無幾。對此，牟宗三的解釋是這樣的：

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牟宗三先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第 26 冊，頁 777。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土地的供給，於人們是公的、無偏向的：只是經過了各家庭的祖先的佔有開墾的勞動的施與，它才成了私的、特屬的。各家庭的祖先將其由所變成的、私的、特屬的土地，按其子孫之多少，均勻的分配之。勞動力大的祖先，耕種力廣的祖先，其所屬的土地將也比較的多。但是，人們的勞動力（國翔按：此處疑缺一「是」字）<sup>（註8）</sup>有限度的並且是相若的，其耕種力也是有限度的並且是相若的。超過了他的勞動力，超過了他的耕種力，那土地便成為無用的。因此在原始土地的佔有將是不差上下的。以此不差上下的土地均勻地分給他的子孫，將也是不相上下的。這叫做自然的分配。<sup>（註9）</sup>

第三，是「土地的盛衰分配」。牟宗三認為，這種分配是在「自然分配」的基礎上發生的。在接著上引說明什麼是「自然的分配」的那段話之後，牟宗三說：

只是在有些子孫只消費不生產的時候，才有懸殊的情形發生。只消費不生產的子孫，雖有地租的供給，也會坐吃山空的。窮了，把祖宗的遺產轉賣給另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富了，其子孫也會給他坐吃山空的消解了，而另轉賣他人。這種轉來轉去的分配法便叫做盛衰的分配法。

（註10）

在牟宗三看來，「盛衰的分配法與自然的分配法結合起來，即造成現在的土地分配的局面」。<sup>（註11）</sup>不過，除了自然的分配法和盛衰的分配法之外，牟宗三指出，還有兩種屬於社會範圍內的影響土地分配的因素，即社會力的分配和政治力的分配。

第四，是「社會力的分配」。牟宗三指出，所謂社會力的分配，是指社會變亂造成的分配。對此，牟宗三引用了武仙卿發表在《食貨》半月刊第1卷第2期〈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轉變〉一文來加以說明。在該文「莊園的形成」一段中，武仙卿具體分析了魏晉時期大集團形成的三種原因和四種形式：

8. 匿名審查人核對原稿，指出此處無「是」字。但依文義，當有此字，當係作者書寫或於《再生》排印時即遺漏。

9.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8。

10. 同上。

11. 同上。

這時大集團的形成，有三種原因：一是因為稅役煩重，自由農民離村避役，離村以後成為農民，流民或自相屯聚而成部落，或投靠豪強以作佃客。二是奴隸欲得身體的解放，脫逃主人而為流民，再依庇於豪強保護之下。三是因為社會的紛亂，弱小的地主，自己不能防禦暴亂以保護自己的財產，不得不依大族與有力集團的庇護，同時無地可耕的農民，也願向大土地所有者要求土地耕種，有力者之得到貧弱的依附，遂形成大集團組織的形式。這集團的組織，造出貧弱對富強的附屬關係，在身份一方面成為部曲或佃客，在生產一方面，小土地歸於大地主支配之下。依附的人民由自由的地位淪為半自由的農奴，被依附的豪強就變成了封建領主。所謂大集團的形成，不外四種形式：(一)流民之相聚，(二)宗族之相聚，(三)部曲之招引，(四)貧弱之依附。(註12)

在牟宗三看來，「這四種形式所形成的大集團即表示土地權的集中，而耕種權的分散。」(註13)並且，雖然「這種形成的方式在現在不必能發生，但遺留下來的土地分配的現狀，由這種形式卻很能說明其形成的原委。」(註14)因此，牟宗三認為，這也是支配中國土地分配的原則之一。

第五、是「政治力的分配」。關於政治作用造成的土地分配，牟宗三認為也可以有四種形式，即「(一)帝子神孫的皇莊，(二)官僚的食田，(三)宗教的寺院（譬如佛）與祭田（譬如孔），(四)行軍時的屯田」。(註15)對於這四種政治力的作用所造成的土地分配，牟宗三都具體進行了說明。譬如，他引用鞠清遠在《中國經濟》第2卷第7期發表的「皇莊起源論」，說明了第一種形式帶來的土地分配。他還聯繫當時的局勢，指出雖然革命導致了寺院廟產的減少，但由於「戴院長的修廟念佛」、「近年來的尊孔」等因素，寺院廟產和孔子後裔祭田又都重新獲得了保障。在牟宗三看來，「這四種政治力造成的土地分配，在現在還是或多或少或變形的繼續存在著。所以這種政治力的分配不但是過去，就是現在也可適用。」(註16)

12.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8-779。

1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9。

14. 同上。

15. 同上。

16.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80。

對於這五種土地分配原則各自所造成的後果，牟宗三進行了如下的概括：

- (1)家庭單純的對於土地的關係：因此關係，不易有其他經濟上的條件使窮富過於懸殊，使土地分配超於極端。
- (2)土地的自然分配原則：按此原則，無窮富之懸殊。
- (3)土地的盛衰分配原則：按此原則，有窮富之懸殊。
- (4)土地的社會力的分配原則：按此原則，易造成私人地主與莊園。
- (5)土地的政治力的分配原則：按此原則，不但能造成私人地主和莊園，而且也容易造成特殊式的公有地主或莊園。(註17)

大體而言，牟宗三所概括的這五種土地分配的原則是基於對中國歷史的觀察。當然，他也明確意識到中國歷史上南北地區的差別。譬如，就社會力和政治力原則所影響的土地分配而言，牟宗三便指出：「不過歷史上華北的戰亂比較多，所以社會力的分配容易在華南出現，故華南的地主占成數比較多，而政治力的分配的(國翺按：疑此「的」為衍字)(註18)中的屯田容易在華北出現，故華北私人地主占成數比較少，而國家莊園在以往卻常占比較多的成數。」(註19)因此，他總結認為，「這五個原則便是認識中國（尤其是華北）的農村經濟的主要關鍵。」(註20)

對於牟宗三來說，家庭不但是組織社會的基本團體，更是中國農村經濟關係的基本單位。而家庭的各種分化，直接導致人口的不同分配。在牟宗三看來，家庭的分化又可以有四種情況。

第一、是自然的分化。牟宗三指出：

每一家庭便是以男女夫婦為中心的一個小集團。有成為夫婦的資格，便有成為家庭的資格。夫婦譬如是一個主座，環而拱之的譬如附庸，附庸與主座的結合便是一個自足的排他的自成一系的整體。這個整體每欲自成門戶而獨立，即是說，其離心力非常之大。每自成一系而獨立的整體便是一個小家庭。因為他最容易自成一系，又因為他最富有離

1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83。

18. 匿名審查人指出原稿此處有「的」字。但有「的」此句文義難以通順，故當係作者書寫或刊印時的衍字。

19.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80。

20. 同上。

心力，所以中國在倫理上雖讚美大家庭，然而事實上，一關於厲害的經濟關係，則又最易於分居，而小家庭幾成為普遍的事實。這種家庭的分化便叫做自然的分化。(註 21)

家庭自然分化的結果，是人口的分散，即每個家庭的人口不會很多。牟宗三接著說：

由自然的分化而成立的小家庭，其人口自然不能很多，平均為五口之家。然而，事實上每不如此整齊單一，四五口、五六口、七八口，總是錯綜著。然無論如何，人口總不能很多。(註 22)

第二、是倫理的分化。牟宗三指出：

除去家庭的自然分化而外，還有一種受禮俗影響的倫理分化。這種分化即是禮俗所讚美的大家庭的維持。大家庭即是好多自成一系的小整體的合作。支系愈多，人口亦愈多。人口增加便隨著也必須增加土地，不然便不足維持。鄉間老人常言，出生一個人便須買地一畝。(註 23)

按照倫理的分化，家庭會越來越大，人口也相應會越來越多，土地也會越來越集中。但是，牟宗三同時認為，這種會導致人口增多和土地集中的倫理分化往往只是表面現象。由於大家庭其實由相對獨立的小家庭構成，小家庭的離心力自然會使大家庭逐漸趨於瓦解。他說：

看起來，這一個家庭，土地很多，牛驢騾馬成群，其實它乃是好多支系的集合，它有好多支系在背後預備著來分它。所以鄉間有句俗話說：「大日子分小了，小日子分了了。」大家庭因為禮俗的關係，總是喜歡維持著這一個紙老虎，及至農場經營出入不相抵，消費多，生產少的時候，便不得不分化而成為各顧自己的小家庭。(註 24)

2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81。

22. 同上。

23. 同上。

2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81-782。

所謂「中國在倫理上雖讚美大家庭，然而事實上，一關於厲害的經濟關係，則又最易於分居，而小家庭幾成為普遍的事實」，恰恰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判斷。這種判斷，大體符合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庭結構。

就人口的分配來說，自然的分化和倫理的分化都是常態之下的自然演化。除此之外，牟宗三認為，影響土地分配的社會力和政治力，也同樣會對人口的分配發生作用。因此，社會力和政治力所導致的人口分化，是人口分配的另外兩種情況。這兩種分化的原因雖然不同，但結果卻異曲同工，就是使得小家庭更為孤立。牟宗三說：

這兩種力把土地弄成所有權的集中與耕種權的分散，隨著也是把家庭弄得非常小，或甚至只用了些單人獨馬集合起來，耕種地主們的地。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小家庭都是對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負責，並不像在倫理分化下的大家庭中的各個分子間的對立關係。並且在這種情形下，大家庭固然不易出現，即小家庭也（國翔按：此處疑缺一「不」字）<sup>（註25）</sup>易健全。中國人口分配之零碎與不健全，這種情形也可解析一大半。<sup>（註26）</sup>

和考察土地分配一樣，在逐一說明了不同人口分配原則之後，牟宗三也對這四種人口分配各自所造成的後果進行了總結：

- (6)家庭的自然分化原則：按此原則分化，則家庭每不易大。
- (7)家庭的倫理分化原則：按此原則分化，每有集合各系之大家庭出現。
- (8)家庭的社會力的分化原則：按此原則分化，許多小家庭為同一地主的莊戶或佃戶。這種莊戶或佃戶在人格上亦是隸屬關係。
- (9)家庭的政治力的分化原則：按此原則分化，則許多小家庭可以獨立地互不相關地同為或兼為某一寺院、某一皇莊、某一公田的耕戶。<sup>（註27）</sup>

土地分配和人口分配並非彼此孤立，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在總結土地

25. 匿名審查人指出原稿無「不」字。但無「不」字，則於文意正好相反，當係作者原稿筆誤或刊印時遺漏。有「不」字，前句「大家庭固然不易出現」方可與後句「即小家庭也不易健全」兩句相配。

26.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82。

2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83。

分配與人口分配的不同原則及其不同後果的基礎上，牟宗三對於土地與人口之間不同的比例關係及其後果，做出了如下的兩點結論：

- (10)土地與人口之正比例關係：按(6)(7)兩分化原則，則家庭小土地少，家庭大土地多，反之亦然。此種比例關係不易發生窮富懸殊的現象。
- (11)土地與人口之反比例關係：按此種關係，則土地多人口少。前者變而為富農，為地主；後者變而為佃農，為雇農，為土棍，為流氓。兩極端階級由此關係發生。但此極端卻不必由前所云社會力及政治力而造成。（註28）

## （二）、生產方式

在具體討論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之前，牟宗三首先進行了兩個區分。一是指出了生產方式與土地制度的不同；一是指出了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不同。對於生產方式與土地制度的不同，牟宗三說：

生產方式就是如何去生產的問題。此又與制度稍微不同。制度可以是知識階級的理想，可以是政府的策劃，可以是關於地權分配的整頓、分配的形式，而不關於生產問題，尤其不關於生產方式問題。如是，生產方式只限於生產方面的如何生產，其範圍側狹而具體。如是，在歷史上，耦耕的籍田制，換土易居的爰田制，一畝三叻的代田制，可以表示出一種生產的方式來，而井田制（或有或無，都無須論），董仲舒的限田制，王莽的王田制，西晉的占田制，後魏的世業口分的均田制，以至宋之不能行均田藉均稅以均田，直至王安石的方田之均田制，至最近等等制度，都是屬於私有下的土地分配問題的，都不能看出一種生產方式來。它們是土地制度而不是生產方式。土地制度可以愈行而愈遠，名目百出，而生產方式則常握在實際耕種的農民手裏，它總是頑固的為能力為時代所支配，急也急不得，快也快不得的。土地制度縱然當其生效時能影響了生產方式，但其對於地權的分配，人與人的關係有直接的影響，而對

28. 同上。

於生產方式卻無直接的影響；即是說，有時土地制度改變了，而生產方式卻並不能隨之而改變。同樣，生產方式改變了，土地制度也不一定隨之而變。（註29）

對於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不同，牟宗三認為：

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並不相同。生產關係是法律政治所表現的生產制度，如地權關係、雇傭關係等便是。而生產方式仍純是經濟上的範疇，它是凝固在活動的生產過程中的。我主張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不能決定社會形態，其原故就在這裏。而馬克司（國翔按：即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卻恰恰正以這兩個東西決定社會形態的，吾未見其對。須知縱然有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名稱，但是這些工具與社會形態之間究無直接的必然的因果關係。在以往如此，在現在亦復如此。你從這些工具來看社會形態可，你說他決定社會形態則不可。（註30）

牟宗三之所以要強調生產方式與土地制度和生產關係的不同，當時主要針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觀，正如上引文中最後部分所顯示的那樣。這也是牟宗三早年一開始即從學理上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表現。不過，早年的牟宗三雖然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許多基本論斷，但在思考中國社會問題的著眼點或者說方式上，卻可以說不能不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譬如對於土地分配、人口分配以及生產方式的重視，以及後文將會介紹的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案中對於經濟因素的注重等，都無不說明了這一點。對於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許多根本差異，牟宗三一開始就有著高度自覺，並終其一生始終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和回應。可是，就連他這樣的人當時在思考中國社會問題時都受到馬克思主義思維方式的制約。事實上，無論接受與否，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問題及其分析社會問題的方式，三〇年代的確幾乎成為中國廣大知識人普遍的問題意識。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在當時中國知識人中影響之大，以及最終取代延續兩千餘年的儒家思想而成為中國的意識形態，實非偶然，值得深思。

29.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1。

30.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1-802。

儘管牟宗三爲了回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觀，從而首先對生產方式與土地制度和生產關係的不同做出了說明，但他並沒有割裂三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對於當時中國農村生產方式的特點，牟宗三恰恰是緊密關聯於土地分配制度和生產關係，採取歷史回溯的方式來加以研究的。

對於中國歷史上不同的生產方式，牟宗三概括爲三種，就是前引文中所謂的「耦耕的藉田制，換土易居的爰田制，一畝三畝的代田制」。關於藉田制下耦耕的生產方式，牟宗三引用了曾謇發表於《食貨》第1卷第7期〈西周時代的生產概況〉來加以具體說明。他概括所謂「耦耕」的特點如下：

他（曾謇）說西周的農業是繼承著殷代的。這時是使用青銅器的時代，鐵尚未被使用著，器具的供給是很稀少的。他們用的耒耜是兩人用腳踏而入土的。這種情形就（國翔按：此處疑缺一「叫」字）<sup>（註31）</sup>做「耦耕」。「耦耕」就是兩人共用一具而耕。所謂耒耜是一器的兩部名稱，並非兩件器具。「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韋昭《國語》注）京房云：「耜，耒下耜也。耒，耜上勾木也。」可見耜是入土的部分，耒是兩人把柄的部分。兩人蹈耒而耕，故耦耕皆從耒旁。其形似與今之鐵鍬相類。每見農夫用腳踏鍬而取土，蓋一踏則力大，力大則鐵鍬入土快而深。當年蹈耒而耕，恐亦是此種情形，不過兩人耦蹈而已。所謂藉田之「藉」，據云即係像人蹈耒而耕之形，故曰「藉田」。<sup>（註32）</sup>

在藉田制之後爰田制之前，牟宗三還提到了井田制。中國歷史上是否有所謂井田制，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學界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井田制下的生產方式如何，當時學界所知更是不多。關於井田制的問題，牟宗三大體接受錢穆的看法，並有他自己的推斷。他的看法是這樣的：

及至人口漸漸多了，社會的組織漸漸的複雜了，鐵的使用已經普遍了，工具的種類已經繁多了。這種耦耕的藉田制，便可以消滅。繼之而起的便可謂井田制。井田制至現在還是爭論的問題：有人承認它有，有

31. 匿名審查人指出原稿有此字，則《全集》刊印時脫漏。

32.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2。



人承認它無。錢穆先生對於井田有新的解析。他以為孟子所說的「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似百畝，同養公田」這種整齊的豆腐塊式的土地未必有，但是幾家共耕著一塊土地，並從中取出一塊來為公家耕種，這種情形卻可以存在。他這見解，我覺得很可取。藉田制可以符應著氏族社會及家族社會，即氏族共有制與家族共有制下才有藉田制的發生。井田制則符應著封建制，即由家族共有制轉化為國家共有，在這種國家共有下，共耕種一塊土地的家族或家庭便是井田制。（註33）

至於井田制下的生產方式，牟宗三則是這樣推測的：

井田制自然有其生產方式，但因為「井田」這個名詞，乃是代表著一個政治制度，所以前邊論生產方式，並未有把它列在裏邊，而只把它當作一個土地制度看。若說這時沒有生產方式，那便錯了。這時的生產方式，工具雖然多了，耦耕雖然廢了，但恐怕還是蹈耕（一人蹈）居多數，其耕種的種類想亦不能十分多，耕種的技術想亦不能十分高明。我不知牛耕起於何時，犁之創造起於何時（當然可以考究出來），也許就在此時亦未可知。牛犁的使用是中國農業上劃時代的一個時期，因為到現在還是用牛犁呵！（註34）

如果說藉田制下的生產方式是從工具的使用方面看出的，那麼，爰田制下的生產方式，牟宗三則是從耕種的方法上來加以觀察的。首先，牟宗三對於什麼是爰田制以及爰田制實行的時代進行了說明：

爰田制（亦作轅田制）是繼續著井田制而來的。井田制還算是國家公有，至爰田制乃漸成為私有制的雛形了。爰者換也，爰田即是換田。換田制即是輪耕的辦法。在爰田制的名目之下，有兩種情形發生：（一）爰

3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3。牟宗三這裡所謂錢穆對於井田和公田的解釋，當指錢穆發表於1932年6月《燕京學報》第11期的《〈周官〉著作時代考》一文（現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98），尤其是該文第三節「關於田制」的內容。事實上，牟宗三曾經在其〈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向改造現社會〉一文中詳細討論過公田制或井田制的問題。其中，他就曾經具體徵引過錢穆《〈周官〉著作時代考》文中的觀點。

34. 同上。

土易居，即又換土又換居的辦法。譬如地分三等，上等百畝為不易之地；中等二百畝為一易之地，即每年耕百畝，二年而遍；下等三百畝為再易之地，即年耕百畝，三年而遍；此謂爰土。爰土三年而遍，便行易居，即前耕百畝者，今易居而耕二百畝，二百畝者耕三百畝，三百畝者耕一百畝。如此易法可得其平。這種爰土易居的辦法，或在井田制之下施行，或在井田制之後施行，皆有可能。但總比爰土不易居的辦法在前。(二)爰土不易居，這種制度是成立於商鞅。爰土易居又笨又麻煩，爰土不易居便可各安其處。商鞅提封疆開阡陌，以盡地利。提者決也，開者廢也（非開建之意）。把以前井田制時代的封疆阡陌盡行提廢，使其成為可耕之地。這是商鞅的第一步工作。第二步工作便是改爰土易居為爰土不易居。爰土不易居即是只換田不易廬舍，令民自在其田不復易居。這個換田的辦法，也與爰土易居之爰土一樣；上田百畝，無須易換；中田二百畝，每年百畝，二年耕遍；下田三百畝，三年耕遍。土地之分配按地質之上下而多少之，得田者亦不必易居。這是又穩定又公平的辦法。（註35）

較之以往的藉田制和井田制，爰田制最為重要的意義是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並且，所有權的觀念隨之產生。對此，牟宗三也做了提示。但是，牟宗三的關注顯然不在於作為土地制度的爰田制，而是爰田制下所體現的生產方式。因此，他進而指出：

我所以要注意這種爰田制，就是因為他表示著一種生產的方式。這種方式就是輪流休耕的辦法。輪流休耕可以養田，這已感覺到土地的報酬遞減現象了。或許，這時還不知使用肥料，所以才換土休耕，但至人口繁多了，社會複雜了，換土休耕便不容易維持，肥料也知使用起來。所以爰田制的成立，不但私有權因之成立，即生產方式與工具也必隨之而日形繁雜了。（註36）

對於藉田制和爰田制在中國歷史上具體所對應的時代，牟宗三並沒有特別明

35.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4。

36.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5。

確地指出。但是，從以上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牟宗三看來，藉田而耕大體是西周時期的生產方式，爰田制下爰土易居或者爰土不易居的輪流休耕的生產方式大體上實行於戰國和秦朝。而對於所謂代田制，牟宗三則明確指出是西漢時期的產物。並且，和爰田制一樣，代田制下的生產方式也是從耕種方式上來看的。對於代田制下的生產方式，牟宗三的討論共有三個要點。一是說明什麼是代田制，二是指出代田制較之爰田制的進步，三是對代田制的歷史地位做出評價。

對於何謂「代田」，牟宗三在徵引《漢書·食貨志》和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四〈田制〉的基礎上進行了解釋。

代田的辦法是這樣的：「（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漢書·食貨志》）徐光啓《農政全書》卷四〈田制〉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耨之，其隴中曰畝，畝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畝與伐高深廣各尺。一畝之中，三畝三伐，廣六尺，長三百尺。以此計畝，故曰終畝，曰競畝。」<sup>（註37）</sup>

他這段話還是指古者耦耕而言，但是一畝三畝的解析可適用於代田。代田所謂一畝三畝，照徐氏的解析，即是一畝之中，三畝三伐。伐者其高陵處，畝者其低平處。畝同於畎。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高尺曰伐。徐氏所謂「高深廣各尺」，即言高伐一尺，廣一尺，深一尺。廣深之畝為耕種之處，高陵之伐為不耕之處。歲代處，言今年耕種的畝易為明年不耕的畝，今年不耕的伐易為明年耕種的畝。這種畝伐代耕的代田亦有爰田休耕之意，但所換者乃是畝伐更換，並不是百畝更換。並且這種畝伐更換，除去休耕之意，還有一種好處，就是能耐風旱。<sup>（註38）</sup>

在牟宗三看來，代田和爰田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休耕。不過，代田較之爰田的差別，關鍵在於以「畝伐更換」取代了「百畝更換」。在這種轉換之中，其進步之處在於兩個方面：一是使農作物更能夠抵禦風寒，另一個是耕種工具的進步。對此，牟宗三指出：

3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5-806。

38.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6。

《漢書·食貨志》：「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此言苗長大後，鋤去隴中之草，將其土隴下以附苗根。每鋤一次草，輒附一次根。《詩·小雅·甫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指除草而言，芋指附根而言，附根即指將隴伐之土隴下培植而言。這樣芸芋下去，比至盛暑，隴土已盡，而根亦深，便能耐風耐旱，故禾苗儼儼而盛。這種遞相刈伐的更代辦法實在是很進步的一種生產方式，比爰田休耕經濟得多了。（註39）

至於耕種的工具也比以前大見進步：「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甌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漢書·食貨志》）「縵田謂不為畛者也。」（師古注）言代田以前之縵田決不能如現在收穫之多，而代田一興，其收穫能過縵田所收一斛以上，善者且過縵田二斛以上。生產方法進步，生產力當然也進步。收穫多，人樂為，故天下莫不耕種，但這是新興之法，故須教民耕種：「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做田器。二千石譴令長、三老、力田，及裏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多墾辟。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同上——國翔按：指語出《漢書·食貨志》）（註40）

依牟宗三之見，西漢時期興起的代田制，使得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趨於完備。並且，代田制下的農業生產方式，一直維繫到民國初年，並未有根本的改變。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牟宗三盛讚漢朝之偉大，認為兩千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無論在思想、政治還是經濟上，都定型於漢代。

作田器，教耕種，人輓犁，宮墻地，真是極一時之盛。「民皆便代田，

39. 同上。

40.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6-807。

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遠，田野益辟，頗有畜積。」（同上——國翔按：指語出《漢書·食貨志》）代田一興，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便漸趨於完備，一直至今未稍變。猶如政治，自親漢大一統後，便算成了定型，農業亦是如此。吾嘗謂漢朝最偉大，中國二千年來之所以為中國皆定於此：思想系統定於此，政治格式定於此，經濟形態定於此。（註41）

以往常有人認為牟宗三重視宋明而輕視漢代，往往是僅僅讀過牟宗三中國哲學研究方面的著作所致。讀了以上牟宗三對於漢代代田制的描述尤其是對於漢代總體評價的這段話，應該會對牟宗三的思想有進一步的認識。

牟宗三以歷史回溯的方式描述並評價藉田制、爰田制以及代田制下的生產方式，為的是要說明當時中國農村生產方式的特點。在前引文中，牟宗三指出了代田制下的生產方式「一直至今未稍變」，兩千年來中國的經濟形態定於漢代。對此，牟宗三有進一步的具體論證。漢代的《四民月令》一書中對於漢代的生產狀況有詳細的說明，他總結如下：

正月：糞疇可種瓜，可種瓠，可種葵，可種韮韭芥、大小蔥蒜、苜蓿及雜蒜，可種蓼，可種芋。正月盡，二月可種春麥、豌豆。

二月：可種藍，可種大豆，可種胡麻，謂之上時。可種稂禾，可種苴麻，可種瓜。

三月：可種稂禾，可種苴麻，可種瓜，可種胡麻，可種黍稷，可種梗稻。

四月：時雨降，可種黍禾，謂之上時，可種胡麻，可種大小豆。

五月：可種胡麻，可種黍，可種牡麻，可別種稻及藍。

六月：可種小蒜，可種冬葵，可種蕪菁。

七月：可種蕪菁，可種大小蔥，可種苜蓿，可種小蒜，可種芥。

八月：可種大小麥及穰，可種大蒜，可種芥，可種苜蓿，可種幹葵。（註42）

然後，對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牟宗三概括為以下六點：

4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7。

42.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08。

- (一)春、秋兩季耕田用一個犁，一牛一驢，或一騾，或二驢，或一騾一驢，或二牛。一人扶犁，耕完以後，再用耙以扒疏，凡大土塊皆揉碎，畜工與人工與耕同。
- (二)下種用漏斗，一畜拉，一人扶，一人牽引畜，不使偏斜。
- (三)小農場，牲畜不便者，亦用人工輓漏斗，與漢時稍同，不過挽犁者則卻無。
- (四)從下種到收穫之間的或芸或芋亦與漢時同，惟無刈伐之制就是了。
- (五)收穫時或用鎌，或用小鋤，或用人手。鎌割麥割谷，但有時亦用人手拔麥拔穀，此不但小農場為然，即大農場亦常見。這在吾鄉為最普遍之事。這固然由於麥根與穀根入土之淺，但也有合農民的經濟之處，即可以多得燒草是也。小鋤<sup>(註 43)</sup>是用來拔高粱一類入土深的作物。
- (六)補充地方的方法是用肥料，以人畜之排泄物為主。防旱，園地可用灌溉，耕種之地灌溉者甚少，唯有禱天降雨而已。防潦，則簡直無辦法，亦只有禱天晴霽而已。<sup>(註 44)</sup>

將漢代的生產方式與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加以對比，牟宗三認為二者之間並無根本的不同，所謂：「這就是現在的生產方式，我看不出與漢時有什麼大不同。所不同者在(一)耕種的細緻一點，(二)土地的區分零碎一點，(三)工具完備一點，三者而已。」<sup>(註 45)</sup>通過這種方式，對於當時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牟宗三也做出了他自己的判斷和說明。

### (三)、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

在對農村土地分配、人口分配以及生產方式研究的基礎上，牟宗三進而分別從土地分配、農業生產和副業的生產與流通三個方面勾畫出了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大體輪廓。這是他分析中國農村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的出發點。他認為，從土地分配方面來看，可以得出四個結論：

43. 匿名審查人指出原稿無缺字，為「鋤」，則為《全集》刊印時脫漏。

4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09。

45. 同上。

- (一)小農場的普遍存在，
- (二)土地分割的零碎，
- (三)大農場經營的日見稀少，
- (四)土地所有權集中，而耕種權卻分散。(註46)

從農業生產方面來看，也可以得出四個結論：

- (一)生產的工具還是舊式的，
- (二)生產的方式與以前也無大別，
- (三)生產的動力還是人工與畜工，
- (四)生產的收支範圍，平均在三百元左右。(註47)

至於從副業的生產與流通方面來看，則可以得出六個結論：

- (一)副業的量日見其多，
- (二)副業的界限效用日見重要，
- (三)舊副業的範圍日見縮小，但卻不能消滅，
- (四)新副業應運而生，但卻不能消滅舊副業，
- (五)新副業的生產方法與工具，與舊副業同其程度，還是手工業的、零碎的，
- (六)農業產品與副業產品的流通，採取兩種形式：一是牙行經濟，一是合作社，前者的勢力遠大於後者。(註48)

在牟宗三看來，這三個方面一共十四點結論，構成分析中國農村經濟局面和社會形態的前提。從這些前提出發，牟宗三認為可以暗示出兩個基本問題，一個是中國經濟的程度問題，另一個則是自足自給的問題。關於當時中國農村經濟的程度問題，牟宗三有兩個判斷：

- (一)中國經濟還未到充分利用自然與制裁自然的程度，還是在盡人事以聽

46.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11。

47. 同上。

48.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11-812。

天命的，仰望自然的狀態之下過活。

(二)農業的生產還是在舊式的工具與方法之下施行，它並未有進步。(註 49)

關於自足自給的問題，牟宗三也有兩個判斷：

(一)中國經濟的現局是破壞的，不是發展的；換言之，中國經濟並未有進步，但只是被破壞了。進步是自發的蛻變，趨於新形態；破壞是被動的割裂，攪成畸形的並存。

(二)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中國經濟一方可說是自足自給的，一方又可說不是自足自給的。(註 50)

不過，牟宗三並未對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程度問題的兩個判斷加以進一步的討論，他認為，那樣兩個判斷從上述作為前提的三方面的十四點結論中即可明白，不必重複。他所具體加以分析論證的，是關於自足自給問題的兩個判斷。換言之，對於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說中國農村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在什麼意義上不能說中國農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牟宗三進行了詳細的說明，提出了他自己的觀察。首先，為什麼說當時中國的經濟是破壞的而不是發展的，牟宗三認為有三個原因：

(一)中國不是一個獨立的經濟體。

(二)為資本主義的商場，而資本主義並未扶助我們，使我們前進。

(三)中國內部的政府也並未維持這個遺留下來的獨立體，更說不上發展它，扶助它。(註 51)

由於這三方面的原因，牟宗三認為中國的經濟局面便成了一個停頓割裂的狀況，所謂「它成了周圍環境的犧牲品，並成了寄生內部之蠹的腐臭品。」(註 52)

其次，牟宗三還從土地分配和副業生產兩方面證明了中國農村經濟那種破壞而不發展的局面：

49.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12。

50.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



(一)從土地的分配上說，零碎的小農場依然是小農場，而且江河日下，從前所有的富農經營，現在日見減少；生產的工具依然是祖宗傳下來的原始工具，並未加以變化或現代化；生產方法也並未改進，也仍然是在原始的狀態下，並未合理化、組織化。

(二)從副業的生產上說，舊式與新式並存，生產工具與方式也都是手工業的、零碎的、非組織的；生產的目的，舊式的為鄉村農民日常生活所使用，新式的為資本家生產商品之原料。(註 53)

在以上說明的基礎上，對於中國農村經濟這種破裂不發展的局面基本特徵和癥結，牟宗三進行了如下的總結和診斷：

經濟的生產與消費，並未互應起來。都市與鄉村也並未聯繫起來。停頓的農業生產，使著農民過舊式的生產與舊式的享受，自成一個局面而在那裡潛伏著。游離階段以其不勞而獲的不生產的金錢，住在都市里作資本家的商品之消費者，這又是自成一個局面在那裏點綴繼著。產生副業者並非為自己之消費而產生，亦並非為自己製作而產生原料，他乃為資本家而產生原料以製作商品，以備都市游離階級的享受；產生副業者卻無力來享受，縱然這種享受品的前身是出之於他們之手而且是便宜的，但現在卻不便宜，與他們無緣了。這又是自成一個局面在那裡幽禁著。這種種不統一不諧和的畸形並存，就是不發展而割裂的局面。這個局面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之腐敗與帝國主義之拘禁所造成的。(註 54)

關於當時中國農村的經濟狀況，三〇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有過一場廣泛而集中的討論，1935年9月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了一本《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其中收錄了當時有代表性的關於中國農村經濟局面和社會形態的若干論文。將這些文章與牟宗三這裏的觀察相比較，我們不能不說牟宗三的觀察是較為貼近中國農村社會的現實的。

在具體說明中國農村經濟「不發展而破裂的局面」之後，對於他所理解的中

5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12-813。

5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13。

國農村「自足自給」的經濟狀況，牟宗三進行了解釋。他首先指出，一般所謂「自足自給」，可以有以下兩種意思：

(一)內部物產足夠自給，不必假借外人；

(二)內部物產雖不足自給，然以有易無，亦足出入相抵。(註 55)

「自足自給」最爲通常的意思當然是第一種，但牟宗三以爲，「隨著社會的進化，人類是在關係中存在著，閉關自守成爲不可能之事，則自足自給的意義也不得不隨之擴大。如是，第二個意義現在亦可稱爲自足自給。」(註 56)然而，對於當時中國農村的經濟狀況來說，在牟宗三看來，無論是就第一種意思還是第二種意思而言，中國的經濟都不能說是自給自足。他的理由是這樣的：

按著這兩個意思說，中國本是可以閉關自守，自足自給。但是現在並不如此，不但不足自給，而且仰賴外人；不但與外貿易，而且入超成爲家常便飯，年年如此。從這方面說，中國不但不能閉得住守得住，而且出入亦不相抵。自給自足的第一個意思與第二個意思，在中國皆不存在。(註 57)

不過，牟宗三並沒有認爲中國農村的經濟不可以被稱爲「自足自給」。恰恰相反，牟宗三指出，就農村裡邊的農民生活而言，中國又的確是自足自給的。何以如此，他解釋說：

但是，從潛伏在舊式生產與舊式享受的那一個局面方面著想，則中國又是自足自給的。這個自足自給就是農村裡邊的農民生活。他們無力與資本家的商品打交道，他們不得不自成一局面。縱然這個局面，因著資本主義的商品的輸入，而範圍日形縮小，但卻不能蛻變而消滅。縱然在鄉村裡邊，靠著交通方便的地方，有幾種使用的機器是外來的製造品，然農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之所需，卻總是自足自給的。那種外來的製

55. 同上。

56. 同上。

5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14。

造品並不是必須的，縱然有一部分人消費資本家的舶來品，那也只是某一部分人是如此。必須或使用是相對的，農民這一範圍裡是不必須的。因為在他那個階段之下，這種外來品是可有可無，而力量不足過問，遂使之為不必須。所以這個自足自給不是如普通所謂是在將散而未散的，參雜錯綜的殘局。參雜錯綜則有之，然而說是一個東西的將散而未散，卻未必然。因為本著不發展而破裂的局面，則這個自足自給是永遠存在著，決不會消滅而蛻變。所以中國的自足自給，是範圍並存的問題，不是消滅蛻變的問題。長此下去，也許會消滅，即所謂死亡，但決不會蛻變。若要蛻變而前進，則必須有其他條件加入。這便是一個政治問題。

(註 58)

以上對於「自足自給」的說明應該說已經是比較清楚的了。不過，牟宗三並未僅止於此。在〈中國農村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這篇文章中，對於表明他所謂的「自足自給」以及「不發展而破裂的局面」的涵義，牟宗三還加了兩個很長的附注，以具體的實例和資料來論證和支援他的觀點。在 1934 年 7 月 19 日《大公報鄉村建設》第 14 期上，楊慶堃曾經發表過一篇名為〈市集現象所表現的農村自給自足問題〉文章，以山東鄒平縣為例，對於自足自給的問題有具體的說明。牟宗三在〈中國農村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的「附注一」中，在完整徵引了楊慶堃的結論之後，提出了他的兩點回應。楊慶堃的結論是這樣的：

根據上面的事實，可以觀察到在水陸交通運輸都有相當便利的鄒平縣中，許多貨物，尤其是機製品，是依靠著別的社會經濟單位去供給。而縣北每年輸出大宗的棉花，縣南輸出生絲，有時縣的北部和中部也輸出糧食，去交換外來的貨物。機械工業，和現代的運輸，令它和三百里以外的社會經濟單位發生互依的關係。自給自足的局面，可謂發生了重要的搖動。但在別的方面，在研究貨物種類的時候，我們觀察到鄒平仍然自己供給著自己大部分的衣食住和生產的工具與原料。洋布雖然開始從外輸入，而它的人口大部分在穿著土織的土布。縣北雖然輸出大量棉

58. 同上。

花，但所產的糧食，還大部分留下來供給地方上的人口。在交換的組織上，零碎分隔的活動單位，仍然保持著自給自足的結構。這是一個將散而未散的，參雜錯綜的殘局。這是魯中農村現階段的一個事實。我希望留意本問題的人，也詳盡地用客觀的眼光去觀察各國內地的事實，令本問題得到一個較清晰的解白。現在流行著的「農村自給自足已完全崩潰」，或「中國農村仍然完全地保持著自給自足的局面」等論調，祇等於哲學式的想像，而對於問題本身是不能有很徹底的解決的。(註 59)

在前文徵引文獻中，牟宗三曾經有過對於所謂「將散而未散」、「參雜錯綜」的議論，看來是出自楊慶堃的用法。正如牟宗三對於「將散而未散」、「參雜錯綜」並非簡單地否定一樣，對於楊慶堃這裏的結論，牟宗三的回應也毋寧說是一種進一步的澄清與闡明。他的兩點回應是這樣的：

(一)他所謂自足自給是只限於一個經濟單位而言，這種自足自給的事實，我們也承認，即我前邊所說的舊式生產與舊式享受，自成一個局面，無力與資本家的商品打交道的鄉村農民生活。不過在我們看來，自足自給不必限於一個經濟單位，與三百里以外的社會經濟單位發生關係，不必不自足自給，而且與三百里以外發生經濟關係，也不自今日始。不過有一點須注意，即如果這種外來品是來自海外的資本家，便顯示出自足自給。如果來自內部的其他經濟單位中的特產，即屬外來，也仍屬自足自給。自足自給不必限於一個經濟單位。當然，各單位本身間的自足自給，我也並不否認。

(二)他說自足自給是一個將散而未散的殘局，以反對完全自足論者與完全崩潰論者。這個見解，表面觀之，也無什麼錯處。不過，仍（國翔按：此處疑缺一「有」字）未<sup>(註 60)</sup>斟酌之餘地。完全的絕對論者，固然是哲學式的想像，但這種相對的殘局論者也未必恰如事實。試問這個殘

59.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15。

60. 匿名審查人指出，原稿無「有」字。但無「有」文意不通。此處有兩種可能，一種如筆者所謂，當缺一「有」字，而作者書寫或《再生》刊印時即脫漏了，另一種可能則如匿名審查人所說，「未」字當為「有」字。或為作者自己筆誤，亦或為《再生》刊印時有誤。

局，殘到幾時？它原因在那裡？他將來的結果如何？死亡還是蛻變？在一個單位內的衣食住之自足自給，究竟是漸趨於總崩潰，還是不漸趨於總崩潰？這些疑問，殘局論者都未解答。在我們以為現在中國之地位下，這個自足自給的局面不是將散未散的殘局，它只有縮小範圍，不會趨於崩潰或蛻變，因為我們看中國經濟是割裂的，不是發展的故也。我們看自足與不自足決不同於時論，非絕對論亦非殘局論，乃是範圍論，即割裂的、畸形的範圍之並存。一方絕對的不自足，全靠外人（商品大量輸入，入超為司空見慣）；一方絕對的自足，全靠自己（停頓的舊式的生產與享受，自成一無力向外的局面）。這種自足與不自足所造成的種種現象，交互錯綜，於是便把人們的眼睛撩亂了。（註61）

這兩點回應，應當說是牟宗三對於他所理解的「自足自給」和「不發展而破裂的局面」的涵義的進一步說明。照他的說法，楊慶堃所批評的「農村自給自足已完全崩潰」，或「中國農村仍然完全地保持著自給自足的局面」，可以說稱為「完全的絕對論」。楊慶堃自己的說法，可以稱為「相對的殘局論」。而牟宗三的看法，他自己稱之為「範圍論」，即所謂「我們看自足與不自足決不同於時論，非絕對論亦非殘局論，乃是範圍論，即割裂的、畸形的範圍之並存。一方絕對的不自足，全靠外人（商品大量輸入，入超為司空見慣）；一方絕對的自足，全靠自己（停頓的舊式的生產與享受，自成一無力向外的局面）。」

為了論證他的這種「自足自給」的「範圍論」，牟宗三在〈中國農村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的附注二中，還引用了《民間半月刊》第1卷第21期李景漢的〈定縣輸入各國貨物之調查〉一文中有關國貨、英國貨、美國貨、日本貨、德國貨以及俄國煤油與印花布、法國茶品與飲料、荷蘭紅糖、瑞士鐘錶輸入的比例與具體費用。（註62）在牟宗三看來，「外貨的輸入不能扶助中國經濟的發展，不能使中國經濟成一獨立體。因為中國的生產與消費，並未與資本家的生產與消費齊平起來。所以，雖有大量的輸入，並未使中國經濟消滅或蛻變或進步。」（註63）並且，根據李

6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16。

62.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17-818。

6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817。

景漢的調查統計數字，在定縣全縣，國貨占百分之八十四，其餘各國只占百分之十六。如此，牟宗三認為，「百分之十六的舶來品，其從數量種類與效用說，皆不足以蛻變或解體中國農村之停頓的舊式的局面，與自足自給的局面。」<sup>(註 64)</sup>

在牟宗三看來，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是密切相關的，所謂「要想瞭解中國的社會形態，非瞭解這個不發展而破裂的局面不可」。因此，在討論了中國農村的經濟局面之後，牟宗三接著提出了他對於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觀察和判斷。進一步來說，我們從以下的討論可以看到，牟宗三批評將中國農村社會形態判定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均不能契合真相，恰恰在於牟宗三認為兩者同樣對中國農村破裂而不發展的局面缺乏全面的與深入的瞭解。

牟宗三對於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討論，是在對所謂「封建主義」說和「資本主義」說的批評中提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對於中國農村社會形態，學界已經存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不同的主流看法。牟宗三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在當時整個知識界甚至包括各黨派和政治團體在內的整個社會人士普遍關注的思想和社會的整體脈絡中發生出來的。因此，在那樣一個整體脈絡中檢討牟宗三早年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實在是題中應有之義。不過，即便牟宗三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研究是在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說法的批評中呈現的，我們這裏還是要首先集中介紹牟宗三的研究本身。

牟宗三認為，將中國農村的社會形態視為「封建主義」，可以是兩種視角下的產物。一種是「從腦袋方面看，從生活樣式方面看」。這種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只是一般的流俗膚泛之見，並無可靠的理論依據。對此，牟宗三指出：

「封建」一詞，近人無確定的界說，用的時候，又不知何所指。然一般人心目中所指的，似乎既不是經濟，又不是政治，乃是人們的腦袋，或生活的樣式。這部分人即以這種腦袋的意識，生活的樣式，來規定社會的形態。這方法甚不可靠。一般說中國現在是封建社會者，大都根據時下人們的腦袋而立論，或根據時下中國因為尚在與西洋資本主義的生活相反，所以說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根據前者而言，則軍閥是封建餘

6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18。

孽，腐敗官僚是封建餘孽，古籍讀經是封建餘孽，家族觀念是封建餘孽，舊禮教是封建餘孽，因此種種餘孽，所以中國是封建社會。根據後者而言，則凡不看電影而看舊劇，不穿西服而穿大褂，不穿皮鞋、高跟鞋而穿千層底，不燙髮，不跳舞，不袒胸露背，不能不要臉等等，皆是封建意識。中國現在這般人占勢力，所以中國是封建社會。（註 65）

和「資本主義」一樣，「封建主義」一說，自然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但是，上述這種意義上的「封建主義」，卻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結果。由於牟宗三很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因此，對於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中國是「封建主義」，緊接著上引文，牟宗三便首先批判它其實有悖於唯物史觀。他說：

這種看法即是從腦袋方面看，從生活樣式方面看。但是，這種看法卻大背於看者所信奉的唯物史觀。即我們對於唯物史觀持批評態度的人們亦不能從這方面來看社會形態。其唯一原因，即是禮俗不是決定社會形態的主要特徵。從禮俗方面看，經濟史觀便變成禮俗史觀了。

另一種視角就是從經濟方面來看，這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左翼知識份子的看法。而牟宗三所要批評的「封建主義」，其實主要並不在於第一種視角，而恰恰在於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觀。

不從腦袋禮俗方面看，而知著眼於經濟方面的，則說凡是部落的、自封的經濟局面都是封建社會；凡勞役地租、超經濟剝削的關係的，都是封建社會。中國現在還擺脫不了這種局面，所以還是封建社會。這個看法，從農村經濟方面著想，並非不代表一部分事實，但「封建」一字卻甚不妥。並且又忽略了他方的種種事實。為正名起見，不得不予以指正。（註 66）

從農村經濟方面來看，著眼於勞役地租、超經濟剝削的關係等，牟宗三認為

65.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18-819。

66.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19。

「並非不代表一部分事實」。但是，為什麼牟宗三仍然認為將中國社會視為封建社會「甚不妥」呢？在他看來，這種論斷犯了三個錯誤：

社會形態與經濟形態並不相同。社會形態是整個的，經濟形態是部分的，認識整個與認識部分當然不能同日而語。現在一般人第一個錯誤即在以經濟形態當作社會形態。封建是政治方面的一個範疇，是歷史上的一種政治制度，本不是指示經濟形態的。所謂封建經濟只是封建時代的經濟，或者說，與封建時代的經濟相似的經濟。與封建時代的經濟相似，但卻不必是封建社會。近人第二個錯誤即在某與某相似，遂即認某為某。政治形態與經濟形態，隨著社會的總進程，每有相應的關係。在總進程的某一階段上，它們倆相融洽，凝結而成一個特殊的時代。認識某一特殊時代的形態即是認識該時代的整個社會形態。社會形態中的政治形態與經濟形態只是巧合，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也沒有上層下層決定的關係。政治形態變了，經濟形態或不變，然而卻另是一個新社會形態；經濟形態變了，政治形態或不變，然而亦不得其為另一個新社會形態。譬如，說現在為封建經濟的人們，必是以為現在的經濟有些與封建時代相像，但是封建政制卻早過去了，蛻變了。這是政治形態變，經濟形態不變，而社會形態變的證明。再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與工具，雖然可以在社會主義時代同樣存在，然而經濟關係已不相同，一為私有財產，一為公有財產。經濟關係雖不同，然而政治形態卻仍不礙其為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之下，既可以建立資本主義又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縱然在轉變時期，或許需要一次革命。這是經濟形態變，政治形態不變，而社會形態變的證明。這兩個證明都足以表示政治形態與經濟形態無必然的因果關係，但只有相應巧合的關係。近人第三個錯誤即在不認識這個關係，以為經濟形態是什麼，政治形態社會形態亦必隨之是什麼。(註 67)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原理。而牟宗三卻認為，必須將社會形態與經濟形態區分開來，社會形態是整體，經濟形態與政治

6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19-820。



形態都是部分。並且，經濟形態與政治形態二者之間並無必然的決定與被決定的因果關係。具體而言，在牟宗三看來，即便當時中國農村的經濟與封建時代有些相似，也不能斷言當時是封建政治和封建社會。這是上述批評的關鍵所在。

就牟宗三而言，認為中國農村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和那種「封建主義」的觀察一樣，也分為籠統的一般感覺和稍有學理根據的觀察兩種。對於第一種所謂「表面的見解」，牟宗三指出：

資本主義者以為自鴉片戰爭而後，中國已入資本主義的初期，已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這見解甚屬籠統。他們也沒有指出生產方法是關於什麼的生產方法。我看，他們不過是看見中國已有了水陸商埠了，交通也發達了，也有什麼工廠、什麼機器，並也有東方的巴黎、有汽車、有電車、有舞女、有金迷紙醉、電燈的照耀、肉的鼓惑等等，遂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不過，我以為這種看法，與以禮俗或腦袋看社會的封建論者，不相上下，同是一種表面的見解。我對於此等論調，不願多所批評。我以為這些把戲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倒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式的消費而已。因為這些不是我們的生產，即或是出自中國人之手，也不能認為是中國經濟的發展，只不過是為虎作倀而已；不是發自於自己的充實之內部，而是為人做嫁衣裳。（註 68）

另一種不是停留在膚泛的感覺之上，而是從農業的生產方式上斷定中國已經進入資本主義。在牟宗三看來，這種判定的根據，在於富農的經營與商品生產。持論者認為富農的經營就是大農場的經營，大農場的經營即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在內，所謂「牛驢騾馬，雇傭勞動，都是大農場經營的唯一特徵。資本主義與商品生產，即在這裏得其朕兆。」（註 69）對於這種稍有學理依據的看法，牟宗三的批評有兩點。

首先，牟宗三指出，富農經營雖然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初期的特徵，但卻不是決定資本主義之所以為資本主義的唯一要素。在其他條件並不具備和配合的

68.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21。

69. 同上。

情況下，中國當時即便有富農經營，其本身並不能決定整個中國農村的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的，何況當時中國農村的富農經營正在日益萎縮而不是發展。用牟宗三自己的話具體來說：

富農雖然可以達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然而現在中國的富農卻擔負不起這個責任。換言之，資本主義雖可由富農經營得其朕兆，然而現在的生產方法、生產工具至土地分配之下，卻不容易達到。在這三個條件未改變之前，富農縱然有好多馬匹、好多耕牛、好多佃農，也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在以前，騾馬成群，呼奴喚僕的富農多著哩！為何不是資本家，到現在便是資本家呢？何況近來富農日形減少，他們的使用畜，由騾變成驢，由驢變成人工（原因是怕丘八的強佔）；他們的佃農由多變少，由少變無（原因是大農場分為小農場）。這種事實，在許多農村調查裡都表現著。所以富農即便有牲畜與人工，在現在狀況之下，也不能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而何況牲畜與人工日形減少？（註 70）

顯然，牟宗三對於農村土地分配、人口分配以及生產方式的研究，為他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觀察提供了基礎，也是他這裏批評所謂「資本主義」說不能成立的重要依據。

其次，就農村社會而言，資本主義形態的成立，還必須具備一個前提，那就是地主、資本家和勞工相結合而形成商品生產的整體環節。這個前提，牟宗三認為當時的中國農村根本不具備。他說：

復次，農業的資本化必須地主、資本家和勞工三者結合而為商品的生產始可成立。但現在投資農村的卻還很少，謂之為絕無亦無不可。有錢的人存銀行，住租界。誰還肯冒險投資於農業生產？近來所謂銀行投資，不過是信用借貸而已。金融資本家並未投資農業作大規模的商品生產。金融集中都市，為的是消費；富農日形減少，怕的是兵匪；沒有辦法的老實百姓才死守田園哩，稍有出路，便不耕種。此即所謂民不欲耕。

70.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21-822。

到了民不欲耕之時，那有所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註 71）

這裏，牟宗三所指陳的社會現象包括農村金融枯竭以及兵災匪災等，的確是事實。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社會團體從事的社會調查和研究都顯示了這種局面。

在分別批評了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來形容中國農村的社會形態之後，對於這兩種觀點的錯誤，牟宗三進行了如下的總結：

封建主義者沒有顧到全體，而只著眼於一部農村經濟，見農村經濟有些與封建時代的經濟相似，遂斷定中國是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者也沒有顧到全體，而只著眼於一部農村經濟，見農村經濟有富農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遂斷定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前者只注意了經濟的停頓，忘記了社會政治以及國外環境；後者只注意了經濟的發展，也忘記了社會政治以及國外的環境。其失同在不認識這個破裂而不發展的局面。（註 72）

由此可見，正如前文提到的，在牟宗三看來，瞭解中國農村的經濟局面，是正確認識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關鍵。「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論斷，都在於對「破裂而不發展」的經濟局面缺乏足夠的認識。

既然「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不足以形容當時中國農村的社會形態，那麼，究竟如何來判斷農村的社會形態呢？在批評「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說的基礎上，牟宗三提出了自己正面的見解：

我們的見解則以為：本著這個破裂而不發展的局面，從政治方面說，中國究竟是民主國，所以還是民主政治式的（縱然有所謂獨裁）；因而在經濟制度方面，定義上或形式上總是自由經濟，隨之也是資本主義式的；從經濟方面說，都市的消費，表面的虛榮是資本主義式的；而在農業生產上，如果以西洋的現存經濟為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則中國便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如果以前有那麼一個封建時代的經濟，倒與現在

7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22。

72. 同上。

的中國農村經濟有幾分相似；那麼，也可以說中國的農村經濟是與封建時代的經濟相似的經濟，但卻不可說是封建社會或封建經濟。這是我們最後的解剖。

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在形式上或定義上是資本主義式的；在實際上或內容上則是與封建時代的經濟相似的經濟。如果避免「封建」一詞，則可說是原始的、自然的（不能充分利用自然，克服自然的）經濟形態。在此，經濟形態與政治形態不必一致共變，只是相應契合。換言之，經濟形態雖然帶有原始性，但是政治形態可以是開明的。縱然現在的政治無政制可言，亦不必引以為憂。（註 73）

需要指出的是，牟宗三這裏的判斷顯然已經不限於農村社會，而是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整體。不過，由於當時農村構成整個中國社會的主體，關於農村社會形態的判斷以及關於中國社會形態的判斷，往往是彼此重合的。也只有對農村社會的性質有充分和深入的認識，才足以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性質做出判斷。

### 三、牟宗三解決三〇年代中國農村問題的方案

牟宗三不僅對三〇年代中國農村的經濟局面和社會形態做出了他的基本判斷，並且，在 1934 年 8 月 1 日刊於《再生半月刊》第 2 卷第 11、12 期合刊的〈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一文中，（註 74）對於如何解決中國農村的問題提出了他的一整套具體方案。

#### （一）、批評：針對當時流行的四種方案

農村問題是當時中國各界人士關注的焦點，因而當時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解決農村問題的主張。事實上，正是從批評當時流行的幾種主要解決農村問題的主張和路線出發，牟宗三對於所謂「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這一問題提出了他自己

7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823。

74. 收入《全集》中的該文有若干文字缺漏。參見《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1 末尾一句話，以及頁 742 末尾一句話。

的回答。牟宗三指出，當時許多的主張和路線大約可以分為四種：

(一)革命的路線。此派以革命的行動奪取政權，主根本推翻徹底改造，共產黨即為此派之代表，當年之國民黨亦走此路線。

(二)政黨的路線。此派以歐美式的政黨活動作選舉上之競爭以參加政權或奪取政權，此種路線比較是消極的，在現在的中國恐怕不易發生很大的影響。

(三)君子的路線。此派多為知識階級或士大夫階級，他們多到鄉村作實際的建設工作，作移風易俗的社會事業，例如定縣的平教會，鄒平的鄉村建設，以及風起雲湧的合作社等都是。

(四)政府路線。這是自上而下的一種舉動，年來甚囂塵上的統制經濟就是這種路線的表示。(註 75)

牟宗三同時也指出，「由此四種路線，我們可以看出不論在朝在野人士都注目於這種危亡的局面了。作法雖然不同，然而目標則一」。(註 76)所謂「目標則一」，即是指不同的路線和主張都是要解決農村問題。不但牟宗三自己，在當時的社會各界人士看來，一旦農村的問題得到了解決，整個中國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牟宗三批評了革命的路線。在牟宗三看來，革命本來並非歷史上的常態，而革命路線者卻主張一種不斷革命或循環革命論，希望將革命變成一種歷史的常態。並且，革命也不必一定要訴諸武力和疆場撕殺，而革命路線者卻以為只有運用武力才能稱之為革命。按照革命路線的做法，只能導致內戰頻仍。牟宗三認為，這其實並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爭權奪利，對人不對事，最終的結果是同歸於盡。同歸於盡顯然不是應當追求的結果，因此，不應當採取軍事革命的路線。對於反對軍事革命路線的理由，牟宗三從國內和國際局勢出發，舉出了以下三條：

(一)照現在中國本身的情況而論，它沒有力量再容許你們破壞下去，這是全國一致的要求。不論你主張什麼，國家的力量到了最後一著時，總不允許你們唱「由破壞而建設」的高調子。因為此時破壞已超過其限

75.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1。

76. 同上。

度了，再破壞就是消滅建設的可能，斬絕建設的基礎。所謂同歸於盡，就是指此而言。

(二)就革命與被革命的勢力上而論，現在的中央軍好象不是李自成時代的中央軍所可比，至少在力量上中央軍是雄厚於赤軍，操對打的勝算是有把握的。即便消滅不了赤軍，赤軍也難突圍而出。在此局面下，為赤軍著想，最好是解甲歸田，作隱而不顯的組織民眾建設鄉村的實際工作以修養斯民，培養將來作進一步的建設事業之基礎。**這是由建設而破壞，即建設即破壞的策略。**（國翔按：黑體為原文所有）如果硬著頭皮死拼下去，則唯有同歸於盡，徒苦斯民而已。社會主義的目的恐怕一變而為資本主義的宰割，亡國而後要想再作復國運動，那就難上加難了。不要認為這是危言，試問中國有幾個東四省？

(三)就各帝國主義而論，他們為商場起見，他們不允許你長此混亂，他們雖然不允許中國成一個在政治經濟上完全獨立的國家，但是他們也不允許我們成一個無政府的混亂國家。其所以如此，目的就在使中國永遠成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唯其如此，所以紅軍才不容易出（以下缺字）（註77）是事實總是如此。如果我們不肯認清這件事實而永遠作相持不下的混亂，作循環不息的革命，則明末時代的滿清是會進來收拾殘局的。「殷鑒不遠，其在夏後之世。」革命衝動的志士，最好是醒悟一點吧！（註78）

顯然，當時的牟宗三對於紅軍的力量估計不足，也並未能夠料到後來會發生「七七事變」，使國民黨中央軍的力量大大消耗於侵華日軍的作戰中，而經過八年抗戰，共產黨軍隊的實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除此之外，第一點發自他自己希望和平建設的主觀願望，第二點則大體是對當時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基本態度的正確判斷。另外，牟宗三這裏提出的所謂「由建設而破壞，即建設即破壞的策略」，便是其解決中國農村問題的基本原則。至於如何實現這一基本原則，牟宗三有一系列具體的主張。對此，我們後面會逐一介紹和討論。

77. 匿名審查人指出，此處原稿有如下一句話：「頭露面。你罵他帝國主義也好，你罵中國的軍閥與他勾結也好；但」。《全集》脫漏，當依此補上。

78.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41-742。

基於以上三條理由，牟宗三進一步表達了他反對革命路線的看法，他說：

由上述三方面來論，無論是從內看，還是從外看，循環革命的路線都足以使中國同歸於盡，因此我們在現在不主張亂嚷一氣，作無理性的衝動行動。須知這種革命主義的行動實在就是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的心理在那裡作祟。揭竿而起在當時未始無其揭竿而起的原因；但是他起來了以後，他又種下了下次揭竿而起的種子了。揭竿而起的時候就是胡鬧混戰的時候，各人心目中都是天子，都是替天行道，都以為非我不可，於是亂殺一氣，殺到最後，剩下了誰，誰就是天子。到了這時，筋疲力盡，於是與民休息的無為政治便出現了。我常想中國這個民族從來沒有有為過，有為的時候是胡鬧的時候，無為的時候是疲倦的時候。胡鬧疲倦，倦醒了再胡鬧，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史。這就是替天行道的表現史。一直到現在的革命主義還是在作繼續的這個鏈子的夢，國民黨當年是如此，現在的共產黨還是如此。須知人之好為天子，人之好替天行道，誰不如我？照此下去，不混戰胡鬧而何？胡鬧而後，不疲倦而何？我們為打斷這個胡鬧疲倦的因果鏈子，所以必須反對革命主義。須知這種革命主義還是一種野蠻行動，中國不能成為現代式國家就是為此。革命主義與人才主義相反。只要能革命能胡鬧就是好傢伙，什麼知識、道德、學問都是無用的東西，都是資產階級的把戲，都當該打倒。然而蘇俄到了建設的時候，也知引用專門人才。似這等前後矛盾、出乎爾反乎爾的行動，都是十足的野蠻行動。所以這種革命主義實在是要不得的東西。天下事那有這麼容易、這麼簡單，以為非我幹不可？國民黨就是當年革命主義混戰時剩下來的天子，我們現在因為怕同歸於盡，所以暫且讓他一步，我們不主張直接的軍事革命行動。我們要播下即建設即破壞的種子，我們要打斷胡鬧疲倦的因果鏈子，我們要組織現代式的國家，區區不顧一切而爭一時之短長，實非智者之所為。（註79）

革命的路線是牟宗三根本反對的。至於政黨的路線和政府路線，在牟宗三看

79.《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43-744。

來，則是缺乏現實基礎而行不通的。對於政黨路線，牟宗三說：「歐美政黨式的路線我們也不贊成，因為這種行動是有組織有基礎的國家裡面所有的現象。中國現在就根本不成爲一個國家；既然不成爲一個國家，則歐美式的政黨只是以小人作君子，單成了粉飾太平的東西，於內部的組織與健康毫無補益；所以這種浮面的行動我們也不贊成。」<sup>(註 80)</sup>對於試圖實行所謂統制經濟的政府路線，牟宗三更是不以爲然。他認爲，「甚囂塵上的統制經濟之政府路線不過是東施效顰的出醜路線而已。」<sup>(註 81)</sup>所謂東施效顰，是指簡單盲目地仿效世界上一些較爲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謂出醜，則有四點表現：(一)效法各國資本主義之所爲；(二)權力欲之發達；(三)各省經濟割據之形成；(四)局促短淺的眼前應付。<sup>(註 82)</sup>牟宗三指出，統制經濟只有在真正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才可以實行，所謂「有物可統，起了恐慌，便來統制」。<sup>(註 83)</sup>而「中國根本無物可統」，因此，「所謂統制經濟只是隨波逐流，投投時好，於國家社會之根本改造沒有什麼關係的。」<sup>(註 84)</sup>

對於從事鄉村建設的所謂「君子路線」的批評，牟宗三的態度既不是像對待革命路線那樣堅決反對，也不是像對待政黨路線和政府路線那樣認爲根本缺乏可行性。事實上，牟宗三對於從事鄉村建設的君子路線是基本肯定的。他的批評實際上是指出了當時以鄉村建設爲方式的君子路線的種種不足，從而希望有所完善。因此，關於以鄉村建設爲途徑的君子路線，牟宗三的批評或者說討論最爲具體和充分。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具體方案，其實也是一種鄉村建設的路線，只不過與當時晏陽初、梁漱溟所代表的鄉村建設有所不同而已。

首先，我們先來看牟宗三對於君子路線的總體批評。他指出：

那種君子式的無所謂的行動，雖然入了內部作健康的補救，但我們也認爲不能有什麼積極的效果的。可是，我們承認他們的方向是對的，因為他們能實際到鄉村作即建設即破壞的工作。現在所成問題的是在他們是否能作積極的行動。我所謂積極有兩種含義：(一)有一貫的大聯絡；

80.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4。

8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9。

82. 同上。

8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9-750。

8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50。



(二)有一貫的自覺政策(政治主張與經濟主張),這兩者之中尤以後者為最重要。因為有了後者才容易聯絡,不然則所謂聯絡只是社交的門面話,其效力是非常之式微的。我們看現在作鄉村運動的大半是缺乏這種足以成為積極的因素,因為缺乏這種東西,所以其行動的動機還是窮則獨善其身,在莫可奈何的情況之下作一點人生天職的事業。這種事業是發於不忍之心的慈善家的事業,因為是慈善家的事業,所以所作的事情都是那種遲緩迂闊到萬分,然而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又是百年大計的根本辦法。這種百年大計的根本辦法就是教育救國論。然而在我們看來,這種百年大計根本則根本矣,其如無限年不能奏效何!這種工作只能在太平時為滋養的預備事業,於處變則不足。所以這種路線到底是君子路線,其本身之精神雖可佩,然而其效果則微。(註85)

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到,在基本的方向上,牟宗三是肯定鄉村建設道路的,所謂「我們承認他們的方向是對的,因為他們能實際到鄉村作即建設即破壞的工作。」牟宗三所批評的,在於他認為當時的鄉村建設派缺乏自覺的政治與經濟主張,而僅採取一種教育救國論的方式。在牟宗三看來,教育救國論雖然可以說是「百年大計的根本辦法」,但卻「遲緩迂闊到萬分」,「只能在太平時為滋養的預備事業,於處變則不足」,以至於他不免發出了「這種百年大計根本則根本矣,其如無限年不能奏效何」的感慨。事實上,我們在後面討論鄉村建設派時會看到,當時最早和最主要的兩種鄉村建設運動的模式,無論是晏陽初在河北定縣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為組織進行的鄉村建設運動,還是梁漱溟在山東鄒平以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為組織進行的鄉村建設運動,其最初的理念與核心內容都是鄉村教育。只是到了後來才越來越認識到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重要性。如果說他們對經濟和政治因素重要性的意識要在1935年之後才日漸充分自覺的話,牟宗三在1934年就提出的批評,不可不謂有先見之明。

在對君子路線進行了總體批評之後,牟宗三又徵引了當時鄉村建設運動兩位最主要代表人物晏陽初和梁漱溟的一些文獻,將其對鄉村建設運動路線的批評加

85.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44-745。

以進一步的展開。晏陽初曾經在《民間》第1卷地11期發表過一篇〈農村運動的使命及其實現的方法與步驟〉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晏陽初認為，要通過農村運動來實現民族再造的使命，根本途徑在於教育，所謂「中國的農村運動，要實現『民族再造』的使命，其方法非從『實驗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下手不可」。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最初也的確就是鄉村教育運動。但是，在牟宗三看來，這種「十足的君子氣」的「教育救國論」是難以行之有效的。他指出：

這種使命與「實驗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的方法都是十足的君子氣，其使命方法是如此，那麼其所謂聯合當然也是向這種使命與方法去聯合的。……這種聯合的方法當然沒有什麼不可的地方。只是在這種使命與教育方法之下的農村工作的大聯合，實在也只是聯合而已，於國家社會必不能作一有力的推進。定縣諸君十年如一日的吃苦掙扎，結果還是免不了定縣農村的日趨破產。這種破產的情形可參看《民間半月刊》第1期及地7期李景漢先生的〈定縣農村經濟現狀〉及〈定縣人民出外謀生的調查〉兩文，便可明白。我們固然不能以農村破產與否為一種運動成敗之估定，但是這種農村破產卻能證明教育救國論毫不能影響或改變其環境之惡劣，並也不能阻止這種惡劣環境的固有演變，如定縣農村之破產。所以，農村破產就足以證明教育運動在推動或影響國家社會上是沒有實際效力的。所以他的聯合也是沒有效力的；換言之，就是他走的路是沒有效力的一條君子路線。所以如果要想有效力，則君子路向必須稍微改變一點。（註86）

在批評了鄉村建設運動僅僅從事教育之後，牟宗三又對鄉村建設運動缺乏根本方向的認定提出了批評。梁漱溟曾經在《民間半月刊》第1卷第11期發表過〈鄉村建設幾個當前的問題〉一文，提出了認清路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問題。但是對於鄉村建設的路向問題，所謂「鄉村建設是要建設到那裡去呢？或鄉村建設是要建設什麼樣的社會？」梁漱溟並未給出明確的回答。牟宗三引述了梁漱溟該文中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設疑，並且說：「梁先生雖說『我不想在這篇文裡作答』，然

86.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45-746。

而於這段話中已含有一種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憧憬了。」<sup>(註 87)</sup>不論梁漱溟當時是否已經有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憧憬，至少牟宗三當時是的確有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考慮的。在他看來，沒有這兩方面的考慮，即他所謂「一貫的自覺政策（政治主張與經濟主張）」，單純從事鄉村教育的那種鄉村建設是沒有出路的。因此，牟宗三指出：

鄉村建設運動必須在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追求下始能發生力量，鄉村建設運動必須在一貫的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確定下始能發生實際的有效的聯絡。然而，現在的鄉村運動卻還沒有作到這一步，梁先生的疑問只是一個萌芽的疑問，只是一個肇端的啟示。定縣始終如一還是以平民教育為出發點，而鄒平則已有整個的實驗縣為其運用與支配，走他政教合一而最後仍歸於平民教育的路，這即是他們的殊途同歸，而為君子路線所必有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梁先生的疑問若不作一個自覺的確定並將其確定作一有效的推動，則鄒平非步定縣的後塵不可。定縣的平教會不能阻止惡劣環境的固有演變，鄒平的鄉村建設也不能使鄒平破其所應破的產，環境一變，他們是乾瞪眼沒有辦法的。<sup>(註 88)</sup>

在〈農村運動的使命及其實現的方法與步驟〉一文中，晏陽初曾經有過這樣的慨歎，所謂「國家日日都在危急存亡之秋，國人未嘗不忙，忙學東洋，忙學西洋，忙辦這樣，忙辦那樣，結果怎樣？沒有把根本問題認清，瞎忙了幾十年，又來了一個九一八的大禍，依然是坐以待斃，束手無策。就是九一八事變，到現在也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當中又忙了些甚麼？我看照這樣抓不著命脈，咬不定牙根，無遠大的計畫，無持久的耐力，只是一味的瞎忙下去，再過幾十年，恐怕根本就用不著你忙了。」牟宗三抓住這句話說：

可不是！這段話正好用以自警。若再沒有積極的認定，似這樣迂闊遲緩的百年大計，恐怕不用十年，根本就用不著我們來忙實驗了。這即表示要作鄉村運動，非確定積極的行動政策不可。確定了以後，則你從

8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6-747。

88.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7。

教育出發也好，從政治出發也好，從經濟出發也好，都可以得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手的大聯絡。不然，則所謂聯絡只是友誼上的聯歡，沒有什麼大效果的。(註89)

在〈鄉村建設幾個當前的問題〉一文中，梁漱溟曾經就確定積極行動政策的問題提出過三點意思：(一)關於方針路向的認定，請千萬不要逞主觀的理想，哲學的議論。因為這不是盡著我們主觀一面選擇那條路，就可以走那條路的。我們如果提出一種主張，不但要合於理想要求，更要緊的是有其客觀事實的可能。任何一件事能行不能行，都為其相關關係的許多條件所規定：其相關關係的各種條件自又各有其相關關係者在。如是，參伍錯綜，關係重複而複雜，使其可能的路愈窄，只有我們不注意其關係的各方面，或不熟悉不周知其關係的時候，我們才看得東亦可西亦可，海闊天空，任我們走。其實是沒有這麼多的可能的。周圍的形勢所在，早已隱然限定只有一條路。所以我們要是從客觀可能的機會裏實現主觀要求，所採取的方針即是將展開的前途。那麼客觀事實的分析，歷史演變的觀察，就是頂要用心的所在了。(二)鄉村建設有無可能，誠然是嚴重的問題，然天下事常是轉變不定的，逼促地只看眼前這一段，每不免為一時情勢所蔽。要遠從過去推測未來，才能看得通。那麼，仍舊是要在客觀事實歷史演變上用心。(三)總而言之，是要有遠識定見看清前途才行。今日鄉村發達所以喧騰各處，雖大半為鄉村破壞日重日急所刺激起來的。然若就以「救濟鄉村」、「復興農村」為心，那便局促短淺，限於兩種結果：一、太偏乎應付眼前問題，沒有根本方針以事遠大企圖；眼前問題既不會應付得了，更將走錯了路，失了遠大企圖。二、系心於眼前之得失成敗，容易短氣喪氣，失望絕望而幹不下去。老實說罷，當茲人類社會大改造時代，問題已問到深處，則計畫就要計算到遠處，有企圖便是大企圖，沒有什麼「救濟」可言，沒有什麼「復興」可言；說救濟，說復興便是錯的，今日鄉村已是救濟不了。我們現在所向前走的一步一步，其意義原不在當前而在未來。這未來不是空希望，而是看得見拿得穩的前途。牟宗三認為梁漱溟的這三點意思很重要。在他看來，梁漱溟的三點意思關鍵就是一條，即所謂「其實就是按照客觀的事實決定

---

89. 同上。

一條有遠大企圖的唯一可能的路向」。(註 90)不過，這樣一條有遠大企圖的唯一可能的路向應當是什麼，梁漱溟並未說透。正是順著這一點，牟宗三繼續發揮了他認為要自覺結合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主張，作為批評以鄉村建設運動為代表的所謂君子路線的總結：

所以鄉村運動決不可成為「局促短淺」，眼前問題的應付，要有「根本方針」，「遠大企圖」。這種「遠大企圖」就是積極政策化的行動，就是政治制度與經濟行動。這種鄉村運動就是政治運動化的鄉村運動（國翔按：黑體為原文所有）。我們很希望梁先生能早早認定大企圖的路向，並本這個路向作推廣活動，作聯絡活動。我們現在認定政治運動化的鄉村運動就是現在中國客觀事實所隱然限定的唯一可能的路，我們很希望定縣也能作到這樣的自覺與認定，不要死守著那條「實驗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的路向。如果作到了這一步，則鄉村運動便不算得是盲然，而政治運動也不能算得是空洞。如果這兩種運動不能結合在一起，則兩種運動都變成了局促短淺。結果小問題應付不了，而社會的大改造也歸成泡影。所以，我們現在願本這兩種運動的結合為自覺的目標，去作鄉村運動，去作大的聯結，與大的推廣。這是我們所要喚醒國人的，這也是我們所要使一切作農村運動的團體極力注意的。(註 91)

所謂政治化的鄉村運動，在牟宗三看來，就是結合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鄉村運動。牟宗三認為，這種鄉村運動有兩種使命：「(一)替政府作社會之大改造；(二)抽革命主義釜底之薪。這兩種使命結合起來，即是即建設即破壞的策略。」(註 92)在前文所引牟宗三文中，曾經出現過黑體字的「即建設即破壞的策略」這樣一種說法。事實上，這一表述可以說是牟宗三所主張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基本原則。如果說對於上述當時流行的四種解決中國農村問題路線的批評是「破」的話，牟宗三所要正面「立」的，正是他所謂那種「即建設即破壞」的農村運動。並且，對牟宗三來說，這種農村運動是要通過一些具體的組織農民的方式來實現的。

90.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49。

91. 同上。

92.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50。

## (二)、方式：從經濟方面著手，從經濟關係來組織農民

對於所謂「即建設即破壞的農村運動」，牟宗三並未只是提出一個簡單的口號。究竟什麼是「即建設即破壞的農村運動」？其基本特點是什麼？牟宗三有過明確的說明。如何具體實行這種「即建設即破壞的農村運動」？牟宗三也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對於如何理解他所謂的「即建設即破壞的農村運動」，牟宗三是這樣說明的：

即建設即破壞的農村運動，即是組織農民的運動。組織農民的資具，最具體而有效的莫若從經濟方面著手。換言之，即是從經濟關係來組織農民，聯絡農民，比較是有效果的。經濟組織是其他方面的托命線。從經濟方面聯結再擴展到文化方面的聯結，如教育等，若只從教育文化方面的宣傳來聯絡農民，則農民本身是不容易組織起來的。我們的目的是要藉著農民運動以組織農民而達到建國改造社會的企圖，並不是傳教的方式來灌輸知識宣佈精神。你說中國人窮，但生計教育決不足以醫治窮。你說中國人愚，但知識階級的聰明卻只能作壞不能作好，其實農民並不一定就是愚，他心理是雪亮，只是沒有力量來反抗，不會用文字來表達。你說中國人弱，其實農民的身體也夠強壯的了，弱只是文人的現象並不是農民的現象。你說中國人私，然公的思想決不能在教育上可以養成的，我們讀的書，受的教育，那一句話不是教我們作好，作聖賢，作偉人，作有道德的人，結果怎樣？越受教育的人越是自私的人，然則以公的精神來教育農民是並不能去掉他們的私的。所以，窮，私，愚，弱是不能以教育能改正的。這種辦法只是道學家的教訓，聽了這個教訓，在當時未始不怦然心動，但時過境遷，仍是依然故我。所以我們認為現在的農村運動必須改個面目，決不可只從教訓式的教育方面來聯絡，我們當從經濟方面來組織他們。這是我們作農民運動者所當時時自覺的一點。

(註 93)

這裏，牟宗三所針對的認為中國人「窮」、「愚」、「弱」、「私」的說法，是來自於晏陽初。1931年在平教專科學校開學典禮的講話上，晏陽初曾經提到「一般人民最感困難的」這四個方面的問題。<sup>(註94)</sup>在1933年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工作大概〉中，他再次將「窮」、「愚」、「弱」、「私」總結為農村問題中的「四大基本問題」。<sup>(註95)</sup>因此，晏陽初鄉村建設的內容，就是針對「窮」、「愚」、「弱」、「私」而實行的「四大教育」。所謂「四大教育」，就是用生計教育攻窮，培養農民的生產力；用文藝教育攻愚，培養農民的知識力；用衛生教育攻弱，培養農民的強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養農民的團結力。<sup>(註96)</sup>顯然，牟宗三上述言論後半部分的批評，正是集中指向晏陽初那種從教育入手的途徑。而牟宗三自己則認為，由於經濟組織是其他方面的托命線，因而農村運動應當首先從經濟方面著手，從經濟關係來組織農民和聯絡農民，然後再擴展到文化方面。這一點，是通過組織農民運動來解決農村問題的基本原則。如此組織農民的運動，也就是他所謂的即建設即破壞的農村運動。

至於如何從經濟方面入手，從經濟關係來組織農民，牟宗三具體提出了四種方式：(一)藉金融的流通；(二)藉商品的流通；(三)藉農業的生產；(四)藉手工業的生產。

首先，讓我們來看何為「藉金融的流通」。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是都市、農村普遍恐慌，工商業凋敝，只有都市的銀行業不恐慌。銀行業不恐慌的原因正是由於農村的恐慌，因為凡是稍有資產的人都將其資產集中到都市，接受他們資產的便是銀行。當時銀行充實，所謂遊資集中都市，就是指的這種情況。但是，銀行業的金融繁榮必須基於農工商各實業之上，通過流通而獲得。如果農工商各實業不繁榮，只有都市的金融繁榮，那麼，這種繁榮就不是真正的繁榮，資金不得流通，淪為死板的貨幣，充其量不過專為消費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而用，結果就像人得了血栓一樣。這種危險，銀行界很明白，因此當時全國普遍有一股投資農村的聲浪，銀行界也大肆活動。其目的正是要使從農村集中到都市的遊資重新歸於農村，繁榮農業，從而實現真正的金融流通。牟宗三指出，這種辦法就叫做藉金

94. 宋恩榮編，《晏陽初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卷，頁175。

95. 同上書，頁247。

96. 參見晏陽初，〈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演進〉，《晏陽初全集》，第1卷，頁434。

融的流通以復興農村。而在他看來，也可以通過這種金融流通的方式來組織農民。

牟宗三詳細徵引了上海《時事新報》1934年1月1號、3月22號、3月24號、5月15號、6月18號的五條材料以及《申報》5月19號、6月9號的兩條材料，以具體、大量的資料和實例說明了當時銀行界投資農村的運動過程和救濟農村的概況。牟宗三指出，從這些資料和實例可以看到，當時銀行界鑒於農村枯竭與銀行膨脹的局面，急於向農村輸血，其動機與熱情固然蓬勃一世，但具體的救濟方法實質上不外是貸款而已。對於都市銀行向農村貸款的各種具體方式，在《銀行週報》第18卷第29期〈如何使上海遊資及外國餘資流入內地以爲復興農村準備〉一文中，馬寅初曾經歸納爲六種：(一)自設機關；(二)設立農民銀行；(三)辦理跟單押匯；(四)收買內地期票；(五)銀行委託內地著名商鋪代爲收放款項；(六)組織信用合作社，並對每一種方式以實例加以說明。在援引馬寅初總結的這六種方式的基礎上，牟宗三進一步指出：

以上六種方式中前五種只是銀行方面的流通方式。唯第六種即合作社才能算是農民中的團體組織。……此種合作社的組織才是聯結農民的機會，金融是血，現在農村患貧血症，都市患腦充血，我們必須聯結銀行界，並使銀行界互相聯結，以使集中於腦中之血散佈於四肢，我們就藉著這種散佈的機會以組織農民，在四肢血到之處必使各細胞成一種鮮紅自覺的有力組織。各自覺的有力組織之大聯合便是整個身體之再造，便是新精神出現之基礎，改造社會，建設國家必於此始。(註97)

至於合作社的組織形式，《時事新報》曾經在記載上海銀行農業貸款的辦法時分爲五種：(一)運銷合作，(二)信用合作，(三)農業倉庫，(四)農民抵押借貸所，(五)合辦事業。所謂「合辦事業」，即上海銀行與北平華洋義賑會合辦的農業貸款事業。具體方法是由上海銀行提供資金，再由北平華洋義賑會貸給農民。牟宗三也列舉了這五種合作社的形式。而由上引文字可見，在牟宗三看來，通過各種合作社的方式將農民聯結起來，即是所謂「藉金融的流通」來從經濟方面組織農民的方式。

其次，我們來看牟宗三所謂的「藉商品的流通」來組織農民的方式。牟宗三

9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61。



指出：「所謂商品流通，即是商品販賣或運銷之意。藉商品流通以組織農民，最顯然的表示就是現在風起雲湧的運銷合作社之組織。合作就是組織的基礎。」(註 98)而對於以商品流通為目的的運銷合作社，牟宗三又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著眼：「一為農業產品之運銷，一為商人市場之買賣。」(註 99)

關於農產品的運銷，牟宗三是以當時較為常見的棉運合作為例加以說明的。在他看來，「如沒有合作的組織，則許多作為運銷障礙的不方便都發生了，」「有了合作的組織，不但運銷的手續簡單，即金融的匯兌流通也簡單了，敏捷了。」(註 100)他一共舉了三個例子。一是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倡辦的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二是上海銀行先後與金陵大學及華洋義賑會所組織的合辦事業；三是在河北深澤縣梨元村由華北工業改進社幹事盧廣綿指導運營的西河棉運合作社。牟宗三指出，在 1933 年，與(二)有經濟關係的運銷合作社共計七處，其中屬於棉花運銷性質的有六處，分佈於湖南津市、陝西永樂區、江蘇東台、江浦、浙江余姚、安徽和縣等地。剩下的一處屬於雜糧運銷，在江蘇蕭縣。至於(三)，牟宗三認為尤其值得注意。這個合作社沒有政府機構、文化機構和金融機構的指導與幫助，完全只是由盧廣綿個人促成的農民組織。因此，牟宗三覺得這種辦法是「我們所當極力仿效的，也是有為的青年所當極力注意的。」(註 101)他還指出，這三個合作社在 1933 年度經合作運銷的棉花一共有二萬八千余擔，代表棉田四萬六千畝以上。基於這些資料，牟宗三認為，「這些組織如果能有一貫的自覺的大聯絡，則不但是經濟的出路，而且也是社會改造與國家建設的出路之基礎。」(註 102)

關於商人市場的買賣，牟宗三以中國社會古已有之的幫行制為例加以說明。牟宗三認為，雖然在幾個大都市中出現了資本主義的新式組織，但中國傳統的習慣和組織仍然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存在。那種傳統的組織就是幫行制。幫行制相當於基爾特制，並不是某個國家特有的現象，而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他強調說：「中國現在的經濟機構，都市雖似漸入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廣大的內地經濟仍然是

98. 同上。

99.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62。

100. 同上。

10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63。

102. 同上。

中世紀式的。所以這種幫行制，在社會上仍有我們注意的必要。」<sup>(註 103)</sup>並且，根據葉樂群在《復興月刊》第3卷第1期發表的〈我國幫行制史的發展〉一文的研究，牟宗三將幫行的組織分為六種，對其來龍去脈進行了詳細的說明：

(一)幫。幫為留居異鄉之同鄉商人團體，他們或搬運自鄉之產物賣於他鄉之市場，或自他鄉購買貨物販賣於自鄉，或在他鄉設立店鋪幫行一定的營業，從事於其所欲的業務。此等留居異鄉之同鄉商人團體便稱之曰幫，如所謂寧波幫、湖南幫、四川幫、河南幫等是；但幫不必只限於異地人之組織，異業人之組織亦稱曰幫。故幫一方為留居異鄉之同鄉商人團體，一方為同業商人團體，而職人即手工業者所組織之團體亦稱之曰幫。

(二)行。行向為「行列」之意。因之用為陳列市列之意，昔時同業商店排列於市之一定場所，不特其組合稱之曰行，即其街亦曰行；又因一定之商品列於一定之店鋪，商店亦稱之曰行。此風至盡猶存。蓋亦本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之理故也。以後「行」又逐漸分而為兩種意義；(一)行家。以買賣米業者曰米行，以買賣菜業者曰菜行，他們或為他人買賣貨物，而以自己名義經營，或全為自己買賣貨物，或為客戶設備倉庫，或為客商運輸貨物，或為客商辦理通關手續，或為客商收付代金。現代的客棧、驛馬店或其他類似的莊號，即由此蛻化而出。(二)牙行。牙行為媒介營業者，現在所叫做經紀人的便是。其發生甚早，因時代之推移而名稱亦各異；呼曰「駟儉」、「牙儉」、「牙行」、「牙店」、「牙紀」。駟為駿馬，儉為會員，駟儉向指以買賣馬為業之批發商，後遂用於一般批發之義。牙向指天子之居處或一般官府而言，因之「牙儉」應視為官設駟儉之意，後應用於一切事業，不必指馬而言，故曰牙行，曰牙紀，曰經紀。牙行之職務，為奉官設立以調劑商業價格之平衡，向系立於買賣兩者之間，估定貨物價格，按照其額而收牙錢。官設之意，無非欲明悉來往客商之姓氏籍貫、數目、以及貨物品質等情，免掉偷漏關稅之作弊。以後其業務逐漸擴張，不僅居間作批發事業，且兼詢問所業，或更受商人之

103. 同上。

委託自行買賣貨物，或代商人收付貨金，或搬運貨物，或代行通關手續，或設倉庫而保管貨物，或備客室而使商人寄宿；於是其所行之業務愈形廣泛，而牙行因有多數買賣寄宿，恰若為此等商人之合宿交易所。如是，牙行因盡其力之所及企圖客戶便利，不通異地情形之客商亦得安全往來各地市場而經營商業，此種職務已與第一種「行家」之意漸相合一，並與現在之運銷合作社亦一般無二。

(三)會館。此為留居異地之同鄉人以圖互相親善及救濟為目的所組織的一種基爾特。

(四)公所。此為工商業者為增進其本業之共同利益所組織的同業組合事物所，亦稱公會。

(五)公議會。為中國舊式工商業者團體之一種，會館為一都市同鄉客商之基爾特。公所為同業工商業者之基爾特，公議會為包括此兩者之一都市全工商業者的基爾特。其稱呼亦各不一定，曰公議會，曰商會局，曰商務公所，大半因地而異。其組織之動機，對內作異鄉異業之聯絡，對外為維持自己之利益，譬如參加市政，干涉內政外交等。

(六)商會。即商業會議所組織的一種公法人之商政機關，與公議會之作用大略相同。(註 104)

由於這種種幫行組織在中國社會尤其農村廣泛存在並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所以商人市場的幫行制其實是一種重要的商品流通的組織方式。正是因為這一點，牟宗三將其視為運銷合作社之外又一種藉商品流通來組織農民進而改造社會建設國家的重要途徑。恰如他所謂：「統觀以上幫行之組織實為商品運銷之聯絡線，其在各方面之效用與勢力頗大，我們要合作運動，不妨參與其中，即以之為合作組織之基礎，改組之，運用之，支配之，以成為合理的一貫的組織。他們的公議會可以干涉內政，加以堅強的聯絡，獨不可以改造社會建設國家嗎？這要看我們活動的怎樣了。」(註 105)

第三，我們來看牟宗三所謂「藉農業的生產以組織農民的方式」。在 30 年代

10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63-765。

105.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65。

的中國社會，事實上已經存在一定的合作社形式，但主要都是信用合作社、運銷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生產合作社較為少見，而以農業生產為目的的合作社更是少之又少。牟宗三所謂「藉農業的生產以組織農民的方式」，其實就是要建立農村的生產合作社。農村生產合作社在當時為數甚少，關鍵在於土地的問題。在土地私有的情況下，尤其是土地分配零碎的情況下，在農民之中推行合作生產是很難做到的。這也是當時國共兩黨幾乎一致提倡平均地權以求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所在。牟宗三也看到了在土地私有制下合作生產的困難，但是，牟宗三對於國民政府推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說：

國民黨以平均地權相號召；但只注目於平均，結果空嚷了一氣不兌現的平均宣傳，而未注意到生產，所以他不能藉生產合作以促成平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完全是受了共產黨潮流的影響，以為共產是時髦的，所以我們也主張共產；以為打倒資本主義是時髦的，所以我們也主張節制資本。他並沒有觀察到社會的裡邊去，他並沒有認真想著去作經濟的建設以促成社會的改造。他們只想打天下奪政權而隨聲附和共產黨的經濟破壞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其實他何嘗作到了一點？破壞也未作，建設更談不到，只作了些殘酷的內戰，鬧成了現在的局面。

(註 106)

在牟宗三看來，從事社會改造，必須注目於經濟建設。而要達到經濟建設，必須從生產合作入手。雖然在土地私有、土地分配零碎的情況下生產合作十分困難，但並非不可能，尤其是如果有了前述的金融合作和運銷合作，生產合作就是順理成章的。牟宗三指出：

從另一方面著想，我們可以說，有了金融的合作、運銷的合作，不愁沒有生產的合作。只要前兩種作好了，引起了農民的興趣，則自然會引他們入生產合作的門，因為誰不願增加生產？誰不願事半功倍？而這兩種好處，又除非合作不能辦。所以生產合作並不是不能辦的。(註 107)

106. 同上。

10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66。

至於具體的辦法，牟宗三認為可以「由其他合作開導而轉入，其種類或由自耕農自動的組合，或與地主合作而集中佃農的組合，或承辦官產，或耕種廟產，組一以試驗，由試驗而推廣。」<sup>(註 108)</sup>並且，牟宗三還舉了 1934 年 5 月 11 日《天津益世報》所載定縣通訊報導的定縣小陳村合作社的消息，作為論證其所述辦法的例證。定縣小陳村的經驗是這樣的：

本縣一區小陳村合作社，近鑒於耕種合作之利益，特召集村人集合私田，辦理集團農場，俾利用科學生產方法以增加生產，解決農村經濟之恐慌，當經村民全體同意，遂正式組織一合作農場委員會，議決耕種合作辦法，由村中租地百畝為農場根本地畝，其餘私人可自由加入。現已向中國銀行借款一千五百元，以備該農場購置生產工具之用。現該村私人參加者，已達二十餘戶，少數富庶農家，因不詳其利害，尚持觀望態度。聞該農場，先定實驗種棉，且開養豬場及粉房以為副業，苟本辦理有成績時，來年必有空前之擴充與發展云。<sup>(註 109)</sup>

這種生產合作的方式，關鍵在於集合私田，辦理集團農場，由村民組成的合作農場委員會討論決定合作耕種的辦法。對此，牟宗三十分清楚。因此，他在援引小陳村的經驗為例後當即指出：「這實在是一個可模範的辦法。農業生產的合作，就是集合農場的成立。集合農場一成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蘇俄能做到，我們獨不能做到嗎？唯於此，始可言平均，始可言經濟建設。」<sup>(註 110)</sup>

最後，我們再來看牟宗三所謂「藉手工業的生產以組織農民」是怎樣的一種方式。在牟宗三看來，在當時的中國農村，除農業耕種以外的一切副業都可以稱之為手工業。而提倡農村手工業的合作，目的在於「藉此以維持農村自給自足的局面，減少農村的破產性」。<sup>(註 111)</sup>前文曾經提到，牟宗三在〈中國農村經濟局面與社會形態〉一文中曾經引用過楊慶堃刊於 1934 年 7 月 19 日《大公報鄉村建設》第 14 期的〈市集現象所表現的農村自給自足問題〉一文，對楊慶堃的結論有所批

108. 同上。

109. 同上。

110.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66-767。

11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67。

評，認為楊慶堃的說法有未盡之處。不過，在提倡通過手工業的生產來組織農民這一語境中，牟宗三同樣引用楊文對於中國農村自給自足經濟局面的描述和判斷，則更多地是在肯定的意義上。楊慶堃的觀察僅以魯中的鄒平為例，而牟宗三則認為，「實在說來，不但魯中如此，即魯東、魯西亦莫不如此。其實那種與外部的依存，遠不如自給自足的勢力占著主要的支持的地位。我想內地各省更是如此吧！」<sup>(註 112)</sup>但是，牟宗三畢竟沒有只看到自給自足這一面。對他來說，提倡手工業的合作以維持自給自足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則是要以集團的生產從而轉化為機器化的工業為目標。這也是所謂「即建設即破壞」的整體策略的一個環節。對此，牟宗三明確指出：

現在中國的農村，天災人禍區不算外，大部分在衣食住的生活資料方面是可以自足自給的；那種不能自足自給的，只是表示著他是資本主義商場的消費員，並不能表示著中國經濟的日趨破產，鬧成只消費不生產的局面，並不能表示著中國社會真正到了資本主義式的物質生活。在這種局面下，第一步的自救便是發展農村手工業以維持自給自足。第二步便是作合作的組織以期達到集團的生產而成為機器化的工業。這便是即建設即破壞的過程中的蛻變政策。<sup>(註 113)</sup>

陳一曾經在《中國經濟》第2卷第7期上發表過一篇〈發展農村經濟提倡農村工業概要〉的文章。其中，作者通過自己在江蘇無錫農村的調查工作，指出無錫四鄉許多農村通過農村工藝而避免了流離或破產的境況。這一事實，成為牟宗三提倡藉手工業的生產以組織農民的例證。在牟宗三看來，許多農村手工業，諸如弓弦、打席、線麻、剝燈草、裝蓑衣、削竹器、泥玩具、花邊、竹掃帚等，都可以成為農民維持生計的方式。在此基礎上，「再加以擴張與訓練，則可由自給而出售多餘，漸進為商品化，由商品的動機可以進而為集團的經營。『集合全村鄰村所有人力、經濟、信用、物質、共同合作，公社生產場，以村人的公產供村人的需要，並可使農業與工業者，以共存共榮的觀念，互相提攜，達產業復興目的。』

112.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68。

11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67。

(國翹按：這是牟宗三引陳一文中的話) 由集團經營，便可以由手工業轉而為機械工業。集團經營的成立，也必須有合作的組織，始可宣導與推廣。」<sup>(註 114)</sup>這就是通過手工業的生產來組織農民的具體方式。

總之，由以上考察可見，牟宗三提出的組織農民的四種具體方式，從根本上可以說是一種經濟合作化的思路。在這種思路中，合作社是基本的組織方式。

### (三)、目標：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建立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

就牟宗三而言，從經濟方面著手、通過各種經濟方式來組織農民，當然是為了解決當時中國農村的問題。然而，上述種種組織農民的方式還只是手段，並不是最終的目標。對於中國農村問題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問題來說，牟宗三其實有他更為通盤的考慮。換言之，採取多種經濟方式組織農民來解決農村問題，最終是要以中國廣大的農村社會為基礎，兼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雙方之長而避其所短，建立一種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牟宗三在批評鄉村建設運動時之所以一直強調要有所謂「一貫的自覺政策」，關鍵就在這裏。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各自的合理性與問題，以及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牟宗三都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規定。

在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局勢下，牟宗三從經濟入手組織農民從而建立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方案是否可行，其實是需要一些條件而可以質疑的。就像對於土地私有制下組織農民合作生產的困難不無認識一樣，對於其方案可行性的疑問，牟宗三本人也有充分的自覺。他以設問的方式自己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疑問，然後進行了回答。

第一個疑問，是治安問題與政權問題。當時的社會治安問題，譬如兵災、匪災的問題，對於農村社會的干擾和破壞是極其嚴重的。<sup>(註 115)</sup>而政權問題，對於鄉村建設的推行，也十分重要。沒有政府的支持和直接參與，僅憑各民間團體，鄉

11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68。

115. 軍閥部隊對戰區人民的掠奪甚巨。如1928年奉晉軍閥在河北混戰後，敗兵對定縣大肆掠奪，農民損失慘重。具體數字參見李景漢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年初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重印，頁775。土匪給農村百姓生活帶來的災難同樣深重。1930年胡漢民在《中央半月刊》第2卷第24期的一篇演講詞中曾經慨嘆土匪之猖獗，說「目前國內匪患之烈，已經破了民國以來的記錄。」陳翰笙則曾經在《難民的東北流亡》中列舉了一些匪患給農民所造成的損失的具體數字。參見陳翰笙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2輯，頁463-464。

村建設運動是步履維艱的。(註 116)對此，牟宗三的回答是這樣的：

內地不安靖，國家不統一，合作的建設能作得穩嗎？政權不到手，合作的建設能作得通嗎？這固然是疑問。但我們既認為這是（國翔按：指從經濟方面組織農民）運動的策略，所以我們並不夢想這一運動就可以馬上脫民眾於苦海。我們的目的是在喚醒國人，是在使國人有自覺，是在藉著運動找到建國的本錢。我們在這種目的之下，當然希望當局能夠修明政治，永息干戈。萬一不能到此，我們也仍是埋頭作下去，自然會有民眾自覺地出來制裁他的那一天。所以統一更好，不統一我們也不必懊惱，我們自然有我們的一貫做法。至於政權問題，更不必介意，我們不能因為得不著政權就不作事。我們的目的是在作事，是在遠大的計畫的實現，並不在一時的官欲的滿足。若只想滿足一時的官欲，則根本就說不上是一個運動。(註 117)

第二個疑問，就是關於革命的問題。在當時的共產黨人看來，中國當時之所以陷入困境，關鍵在於軍閥、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只有打倒這三樣東西，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的問題。而要打倒這三樣東西，革命和暴動是唯一有效的辦法。如此看來，不走革命的路似乎是不行的。前文我們已經談到，牟宗三對於革命的路線是堅決反對的。因此，對於這種看法，他的回答也很明確。他說：

對此疑問，很易答覆。須知天下聰明並不盡中於共產黨。姑勿論這三種東西不必是根本問題，即便是根本問題，也未必就非對此三種東西拚命不可。譬如殺人者固然是甲，但你卻不必即以殺還之於甲，你可以訴之於法庭；私相殺殺，兩敗俱傷，訴之於法庭者我們能說他沒認清問題嗎？(註 118)

116. 例如，金陵大學農學院在安徽和縣烏江村設立的農業推廣實驗區由於起先未與當地政府合作，以致難以展開，甚至雙方發生衝突。參見孫友農，〈安徽和縣烏江村建設事業概況〉，章元善、許仕廉編，《鄉村建設實驗》，第2集，中華書局，1935，頁111-112。

117.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69。

118.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69-770。



客觀而論，牟宗三這裏對於革命必要性的回應過於簡單。對於軍閥、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這三大癥結的嚴重性，牟宗三的認識不免有所不足。如其所舉訴訟之例，牟宗三是希望通過理性與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但是，在當時的局勢下，強權壓倒公理，無論國內還是國際恐怕都難以找到伸張正義、理性與和平解決問題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牟宗三的認識與他所批評的以鄉村建設派為代表的所謂「君子的路線」其實相去不遠。雙方提供的方案之所以都未能真正解決中國農村的問題，中國社會的演變之所以並未如他們所設計和預期，不能不說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如果說牟宗三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路線可以稱之為合作社道路，那麼，在對兩個可能的疑問做出了回答之後，牟宗三援引了十月革命後蘇聯合作化道路中的經驗，對其思路進行了論證。在牟宗三的援引和相關說明中，蘇聯合作社的經驗甚至成為中國農村合作化道路所當仿效的對象。這一點很有趣，對牟宗三這樣一個自始至終在學理上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人來說，蘇聯經驗居然值得借鑒。這顯然說明，無論對共產主義持何種態度，蘇聯的經驗已經在無形中成為當時中國廣大知識人普遍的一個參照對象。

牟宗三所援引的蘇聯（他稱為「蘇俄」<sup>（註 119）</sup>）經驗，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要說明合作社是使農業國逐漸發展為工業國、分散的手工業逐漸發展為有計劃的機器工業的有效和必要步驟。一是要說明合作社的最終發展不必一定導致絕對的國有化和集權式的國家管理。

根據當時世界書局出版的黃卓的《蘇俄計劃經濟》一書，牟宗三介紹了蘇俄如何通過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來解決傳統手工業與發展國家計劃經濟之間的矛盾。牟宗三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與當時的中國十分相似。農業國的特徵之一就是小規模的手工業在全國的生產制度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由於大規模工業的不發達以及交通的不便，農村中便有從事手工業的農民，城市中也有從事手工業的工匠。在十月革命以後，隨著大規模工業的發展，手工業逐漸萎縮。1924 年手工業的生產尚在全國工業生產總值中佔據 50%，到了 1930 年，

119. 「帝俄」與「蘇俄」是 30 年代知識分子經常使用的兩個概念，前者指十月革命之前沙皇時代的俄國，後者指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政權下的俄國。

手工業的生產已經不到總額的 10%。不過，雖然手工業的規模日益縮小，卻並不能完全將其消滅掉，因為日常消費品的輕工業還需依賴手工業。由於手工業的私有性質及其本身是一種不經濟的生產事業，加之手工業者多半是小資產階級或准小資產階級，因此手工業仍然構成整個計劃經濟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蘇俄政府所採取的兩全其美的辦法，就是將各個獨立的手工業者聯合起來組成生產合作社，使手工業由私有企業逐漸變為政府管理的國有企業。如此便不再構成計劃經濟的妨礙。在這種新的制度下，手工業的資本大部分由政府提供。隨著資本的增加，手工業就可以逐漸採用機器，改善生產方法從而進化為機器工業。如此一來，手工業方面的合作社組織和農業方面的集團農場就一道構成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组成部分。(註 120)顯然，對牟宗三來說，這樣一種經驗是很值得中國的合作化道路加以借鑒的。

合作社的目的是要使傳統的小農和手工業經濟逐漸過渡到現代的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在合作化運動的過程中，合作社的最終發展卻不必發展成為純粹國有的性質和絕對國家管理的模式。十月革命後蘇俄社會合作化的演變過程，便說明了這一特徵。牟宗三指出，根據當時魏學智翻譯的尼亞林、哈代合作的《蘇聯的經濟組織》，蘇聯社會合作社的演化大體是這樣的：

在大戰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合作運動在俄國已有了很深的根基。在一八六四年，中產階級已經組織了消費合作社。後來勞工也組織了消費合作社，但他們的發起人卻是雇主階級。共產黨得了政權之後，便和這些合作社立在仇視的地位。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二日，蘇維埃政府公佈了第一道關於合作運動的法令。這法令雖則還保持著合作社的獨立，卻將權力授予國家經濟機關，讓他利用合作社來購買和分配他們所需要的貨物，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日，又公佈了一道法令，迫令各個消費者都需要加入蘇維埃商店或合作社。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公佈了法令，終於禁止一切反革命者以及中產和雇主階級被選為管理或主持合作社的人。一九一九年，政府又決定一切合作運動都須作為無產階級整個活動中的一個輪子，不能只追尋他自己的合作的目的。以上是

120. 參見《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70-771。

純粹共產主義時代的合作社，但是，到了各國武力干涉和內戰停止以後，合作社又逐漸的得著了獨立的、不受國家機關管轄的購買或銷售的權利。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公佈的法令，雖然繼續將合作社當作國家貿易的輔助機關，雖然仍舊保留著強迫入社制；但卻把權柄授予合作社，讓他們公開地在市場上經營商業，並替政府購買定貨。最後，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政府將收歸國有的財產又歸還了他們，並且此後不許再收歸國有了。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中尚有其他政策的變更，如強迫入社制的廢除，舊日的合作社的分類（消費、農業、工藝、信用）之重新採用，政府維持費的終止給付，在組織上和活動上合作社的獨立權之取得。凡此等等，皆在質上起一大變，合作社將不是純粹共產時代的合作社了。（註121）

由此可見，蘇俄社會合作社的演變可以說經歷了三個階段。從1864年到十月革命之前，合作社在俄國社會已經自發地出現。這是第一階段。十月革命後從1918年到1919年左右，蘇維埃政府一步一步改造了合作社原來私有和獨立的性質，將其強制性地納入到國有經濟的結構之中。所謂純粹共產主義時代的合作社，就是指這一時期的合作社。這是第二階段。外國干涉和內戰停止之後到1924年，合作社又逐漸恢復其私有化的性質和獨立組織與經營的權利。這是第三個階段。該階段是一個逐漸脫離純粹共產主義的時期。

就這三個階段而言，牟宗三特別強調的是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轉變。在牟宗三看來，這是所謂「質上起一大變」。這種轉變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頗為重要，也是由不合於人性到漸合於人性的表現。對於這一質的轉變的重要性尤其是對於中國發展合作化道路的重要意義，牟宗三有如下的說明：

由以上的情形，我們可知合作社的組織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程度中是如何的重要，並也可知蘇俄政府的合作社是怎樣的漸合於人性。其初是絕對的國家管理，後感覺到無謂的濫管，實無多大的利益，隨又予以獨立的自由，到此我們可知絕對的共產是辦不到的，而且也實在是無意義，

121.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1-772。

不過是權力欲發達的無事忙而已，忙到結果也終會感覺到這種辦法實在是無謂的白費力氣，隨又恢復原來狀態。所謂蠻幹，其實就是盲動，即指此而言。此風一成，流到中國，還是不知殷鑒，真是無理性之極。所以我們現在的合作運動，決不可存著這個念頭。現在中國的情形，和蘇俄革命以前的情形一樣，都是農業與手工業的國家。共產黨以無產階級為去取的標準，然而須知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國家裡，根本就不易找到無產階級。普天之下，大半都是小資產階級，你把它先根本推翻了而又扶起來，這有什麼意義？所以我們決不同於共產黨，先去攪一番，然後再恢復；我們是以扶助他們造產為念頭，以指導他們去組織為動機，以漸進於生產方式的蛻變為目的，而達到最後的國家建設與社會改造的企圖，這是即建設即破壞的路向。（註 122）

中國社會的發展，並沒有能夠按照牟宗三的預期和希望。30 年代以後中國歷史所選擇的道路，反倒恰恰是牟宗三所最為反對的革命的道路。然而，新中國的建立或許標誌著革命道路的成功，但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造的目的是否隨著革命路線而最終實現了呢？反思建國以後中國合作化的道路，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前到改革開放之後的不得不然的轉變，對照上述蘇聯的經驗，我們不能不說牟宗三所謂「不知殷鑒」的批評具有某種先見之明。事實上，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牟宗三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析以及他所規定和提倡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我們就會看到，牟宗三基於結合資本主義的「自然的合理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當然的合理主義」而提出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構想，和我們在十年浩劫之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逐步總結出來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相比較，二者之間似乎不無異曲同工之處。

在 20 世紀 30 年代，社會主義思潮普遍為廣大知識份子接受，資本主義一時成為眾矢之的。但是，就是在那種氛圍下，牟宗三仍然能夠從學理上正視資本主義的某些內在合理性，而不是順俗浮說，做簡單和情緒化的批判。他說：

須知社會主義乃是為挽救資本主義的病態出的。資本主義，從根本

122.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 26 冊，頁 772-773。

上說，也是基於合理主義的：個人的、自由的、比賽的，各竭所能，各享所得，並沒有作土匪搶劫得來；不過比賽的結果，時有不合理的現象發生，然而所謂不合理也只是不合道德之理而已。鄉間人把日子過去了，只能忌恨人家富，並未怨恨富人把他的田產搶去了，只能埋怨自己不好過，卻從未埋怨說人家叫他窮了。所以窮的結果只有鋌而走險去搶劫的心理，卻沒有奪回財產去復仇的心理。古人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就是基於這種合理主義之上的現象。就是現在的資本家也是如此。按著道德法律說，你總不能把資本家拉來審問說：因為你是資本家，所以你犯罪，所以我要判你死罪。窮人因搶他可以打死他，法律卻不能說出他有死罪的話來。說到這裡，共產黨們又可以說：你須知道道德法律是統制階級的工具呵！但是我說，設立道德法律之本意並不是專為資本家而設，它乃是一切都可以應用的。(註123)

出於這種理解，牟宗三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提出了所謂「自然的合理主義」與「當然的合理主義」的說法：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的合理主義是自然的合理主義，社會主義的合理主義是當然的合理主義。前者是合科學之理，後者是合道理之理。前者是自然的趨勢，後者是發自於不忍之心。前者是獸性，後者是神性。前者是無所謂的，後者是有所謂的。前者是放任的，後者是拘束的。社會主義就是來拘束的，社會主義就是來拘束資本主義放任之流弊的。這個時代就是拘束的時代，也就是一切都要人的理想來管一管的時代。(註124)

社會主義在當時是思想界的主流，這一點牟宗三並不例外。所謂「這個時代就是拘束的時代，也就是一切都要人的理想來管一管的時代」，也正說明了這一點。但由於牟宗三同時還能夠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有充分的認識，所謂「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說，也是基於合理主義的：個人的、自由的、比賽的，各竭所能，

123.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3。

124.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3-774。

各享所得，並沒有作土匪搶劫得來；不過比賽的結果，時有不合理的現象發生，然而所謂不合理也只是不合道德之理而已。」因此，他所提出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其實基於一種試圖結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雙方合理性而避免其不合理性的構想。

對於他所理解和規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牟宗三總結為以下六個特徵：

(一)所謂計畫也是對付自然活動之病態而產生的。

(二)因為**自然的合理主義**（國翔按：黑體為原文所有）之發於人性而不可磨滅，故確定資本主義之限度；凡在均富或均貧的狀態範圍之內而無可以造成特殊之富與特出之窮者，皆允許其在資本主義的合理主義之下活動。

(三)因為**當然的合理主義**（國翔按：黑體為原文所有）之發於人性而不可壓抑，故確定社會主義之限度：凡在均富或均貧的狀態範圍之內，有可以造成特殊之富與特殊之窮者皆收回使其在社會主義的合理主義之下活動。

(四)凡個人所不能辦不宜辦，並足以妨礙社會公道的，皆在社會主義的範疇之下活動；凡人所能辦所宜辦而並不妨礙社會公道的，皆在資本主義之下活動。

(五)無論在資本主義之下活動，或是在社會主義之下活動，都須按照國家的一貫計畫去發展。需要計畫的當然要計畫，不需要計畫的當然也不必無事忙白費力氣。需要計畫與不需要計畫都在自覺的一貫的狀態之上活動，這便是計劃經濟的特色，這個特色總名之便即是理性的。

(六)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範疇的合作情形之下，再加上國家的計畫與整理之運用，則公道的社會便即出現。至若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問題，在此毫不值得注意，可以說毫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在怎樣的運用所有權與使用權，即是說，在什麼方式之下，運用所有權與使用權給地主作奴隸與給國家作奴隸。在人類文化上說，並不見得有什麼懸殊的差別，所以我們現在並不注意「所有」與「使用」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權利觀

念之移動，而只注意於計畫方式之運用，好像物質的化合一樣。同一物質，在這樣的佈置之下則是這種結果，在那樣的佈置之下，則又是那種結果。我們對於經濟的計畫也是如此。不妨把所有權與使用權都賦予人民（在可以施行資本主義的範圍之內），然而把佈置的方式之有利與否，這種理智上的計畫運用之權，歸之於國家，宣之於民眾。民眾明利之所歸，必樂此而興起，這又是計劃經濟之特色。（註125）

顯然，這六個特徵的關鍵在於結合資本主義「自然的合理主義」與社會主義「當然的合理主義」。具有這種特色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便是牟宗三希望在解決農村問題的基礎上所實現的建設國家與改造社會的最終目標。

#### 四、結語

在牟宗三看來，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建立與農民運動是密不可分的。以合作社的形式為中心的農民運動是實現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具體途徑和策略，以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理性為特徵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農民運動的目標與歸宿。二者合在一起，構成牟宗三解決農村問題甚至整個中國社會問題的整體方案。對此，牟宗三本人具有高度的自覺。在〈復興農村的出路何在？〉一文最後部分列舉國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六點特性之後，牟宗三自己對於農民運動、合作組織（合作社）以及計劃經濟之間的關係如此總結說：「實現之策略在農民運動，即組織農民之運動。組織農民之憑藉在乎經濟合作之組織。經濟合作之聯絡一貫，如輪齒之契合，即是我們建國之本錢，即是計劃經濟實現之基礎。」（註126）顯然，這也可以說正是對其整體方案的最為簡明扼要的說明。

當然，歷史似乎並沒有採取牟宗三的方案。不過，當初歷史對於革命路線的選擇，未必意味著牟宗三所提方案或路向的錯誤。關鍵在於，如果要實行牟宗三的方案，需要一個基本前提，即推翻軍閥、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尤其是後者，或者說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況，取得民族獨立，建立一個真正統一的主權國家。

125.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4-775。

126.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全集》，第26冊，頁775。

不解決這一問題，牟宗三的方案是無法實現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對於這一點，牟宗三是認識不夠而有所忽視的。歷史對於革命路線的選擇，正是爲了解決實行牟宗三方案的前提問題。但是，在民族獨立、統一的主權國家建立之後，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造如果繼續奉行革命的路線，實行完全的公有化以及絕對的國家管理，不能充分顧及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恰如蘇聯 1918 年到 1920 年之間所謂「純粹共產主義時代」推行的合作社路線，則勢必行不通。1949 至 1979 年的中國歷史，在相當程度上可謂重蹈蘇聯「純粹共產主義時代」的覆轍。牟宗三在 20 世紀 30 年代即指出蘇聯合作化運動的過程，強調蘇聯 1921 年之後的合作社不得回歸於產權私有和經營獨立的狀態，並提出「不知殷鑒」的批評，不能不說是對一味革命路線的弊端有先見之明。回顧 1979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在一定意義上，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可以說正是採取了一條試圖結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彼此合理性的道路，儘管這一道路上豐富和具有時代性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牟宗三所總結的六點特色。

最後，前文已經提及而筆者需要再次指出的是，牟宗三在 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並不是孤立的行爲，而是與當時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和鄉村建設運動這兩大社會思潮緊密相關的。因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將牟宗三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放到這兩大社會思潮的脈絡之中來加以檢討和定位。在那樣的脈絡中觀察牟宗三對於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可以更爲明確地掌握其問題意識的來源及其主張的針對性。反過來，鑒於牟宗三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以往並未引起研究 30 年代中國農村問題的學者的注意，他的一些獨特的看法，無論對於當時中國農村問題本身還是圍繞農村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或許都有助於我們產生進一步的認識。但是，限於篇幅，這一部分的內容無法在本文得到反映，只能另文處理了。



## **Mou Zongsan's Study of China's Rural Problems in the 1930s**

**Guoxiung P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 **ABSTRACT**

Mou Zongsan has been treated as only a philosopher up till now. He, however, had stro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rns in his life and did not simply develop his own conceptual speculation sheltered in the ivory tower. He often had thorough and unique observations on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ssues of the day. Some concerns appeared throughout his life, while others emerged from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had resonance with social realities of those periods, and constituted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iscussion or debate of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of the time. Rural problems became the focu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almost all social classes in the 1930s. Mou Zongsan also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1934 and 1935 in which he developed his views on Chinese rural problems, and accordingly became one of th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concerned about and probed problems of rural China in the 1930s. Regrettably, those articles by Mou have not been noticed and discussed in the study of Mou Zongsan and the studies of Chinese rural problems in the 1930s. An examination of Mou Zongsan's study of Chinese rural problems in the 1930s not only can help us to know an important segment of Mou's own thought and understand his concern and achievement besides philosophy, but also can broaden and deepen our knowledge of the discussion of and debate over Chinese rural problems in the 1930s. This article includes two main parts: to clarify his basic judgment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cial status of rural China, and to analyze his prescrip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ural China.

**Key words:** Mou Zongsan, Rural China, the 1930s

(收稿日期：2006.2.20；修正稿日期：2006.4.27；通過刊登日期：2006.5.5)